

Global Media Journal

全球传媒学刊(XV)

《全球传媒学刊》编辑部

主编：郭镇之

副主编：周庆安 卢嘉

编辑部主任：曹书乐

编辑：戴佳 李红霞

主编的话

《全球传媒学刊》电子版第 15 期（2013 年秋）又面世了。这一期的内容主要采自今年 7 月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召开的“2013 年两岸三地五院研究生研讨会”的得奖论文，精选的内容以**当代新闻传播与文化变迁研究**为主题。本期的特邀主编为**曹书乐博士**。

在本期主题栏目中，徐煜的论文以国内新闻传播学者使用微博的情况为例，对他们在新浪微博中的在线关系与其社会资本增加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所采用的“科学”图示方法令人印象深刻。研究确认了“富者越富”假说，亦即学者线上与线下的社会资本之间存在后者影响前者的结构性再生产关系。当然，要对缺乏边际的网络行为进行空间测量，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高晴的“从温州动车事故看中国新闻实践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是一次个案研究，考察的是中国媒体及其从业者在温州动车事故报道的新闻实践中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论文通过一套相当规范的操作程序，以翔实的资料解释了官方控制的方式、媒体“抗命”的存在以及新闻专业人士“戴着镣铐跳舞”的博弈行为。尽管在这一事件发生两年之后，中国社会的关注早已被内地更多新的话题所转移，但研究的细节发掘和作者的独特视角仍然值得学者认真看待。吕嘉薰对主打软性新闻的《苹果日报》进行了读者研究，探讨小报新闻读者的公民参与程度，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公民对政治活动的参与程度与阅读软、硬新闻的偏好之间没有关联，倒是与阅报时间的长短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当然，这种相关性之可靠与否，是否能够得到确证，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上三个研究都是面向现实的新闻传播问题的，也都是以数量化等实证操作工具进行验证分析的，显示了华人世界的研究生在运用传播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方面的明显进步。

本栏目中另外两个研究则侧重于质性的方法。沙垚通过对华县皮影戏的研究，探索了这种民间艺术的传承困境，批评了“非遗繁荣”中的非理性现象，并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对民间文化的本地意义进行了反思，批判了极左政治和市场社会对文化生活的过度干预。谭以诺的论文“后怀旧的资本主义城市：麦兜系列电影中的时间—空间学”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他以文化研究的多重维度对麦兜系列电影中资本主义式的时间—空间装置和创作者的后怀旧主义时间—空间理念进行了解释和分析，扩展了人们对一部电影的反思角度。当然，质性研究要能令人折服，概念的明晰、分析的层次和逻辑的推演都是至关重要的技术。在这方面，研究生都需要更多的磨练。

按照惯例，“全球传媒论坛”展示的是学者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所作的学术报告。本期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华特克朗凯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安德鲁·拉奇教授在演讲（“财经新闻

教育异军突起：永不消逝的潮流”）中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方面，他指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化市场时代，“所有胸怀大志的记者都必须掌握商业知识。这不是一种奢求，而是一种必须”，从而委婉地批评了年轻人对经济生活的某种无知；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了从事经济报道时胸怀人文理念的极端重要性——普通人的基本渴望都与经济生活有关，而“在每次金融灾难背后都是公众们委托授权的‘监察者’的工作失职”，从而强调了新闻工作者理解经济现实、捍卫公众利益的社会责任。

（郭镇之）

全球传媒学刊（电子刊）2013 秋（总第 15 期）
2013 年 09 月出刊

目录

主编的话

封面专题：当代新闻传播与文化变迁研究（主编：曹书乐）

- 新浪微博中的在线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获得：以国内新闻传播学学者的微博使用为例
徐煜
- 从温州动车事故看中国新闻实践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
高晴
- 初探小报新闻读者的公民参与程度——以《苹果日报》读者为例
吕嘉薰
- 乡村文化变迁：阶段，维度与意义——以华县皮影为例探索民艺传承的内在困境
沙垚
- 后怀旧的资本主义城市：麦兜系列电影中的时间—空间学
谭以诺

全球传媒论坛

- 财经新闻教育异军突起：永不消逝的潮流安德鲁·拉奇
廖蝶儿译

附录

近期学术活动信息

CONTENTS

EDITOR'S NOTES

CONTEMPORARY JOURNALISM, MEDIA AND CULTURAL CHANGE

1. Online Social Network and the Attainment of Social Capital in Sina Weibo: A Case Study of the Media Use of Scholars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XU Yu)
2. The Game Between Journalistic Practice and Political Control: A Case Study on Wenzhou Train Collision Accident (GAO Qing)
3. The Degree of the Tabloid Readers' Civil Engagement: A Case Study on the Readers of *Apple Daily* in Taiwan (LV Jia Xun)
4. The Village Cultural Change: Stage, Dimensions and Significance: Taking Huaxian Shadow Pla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Inherent Dilemma of Rural Heritage (SHA Yao)
5. Post-nostalgic Capitalist City: Temporal-spatial Structure in the Mcdull Series (TAN Yi Nuo)

GLOBAL MEDIA FORUM

6. The Rapid Rise of Financial News Education: an Eternal Trend (Andrew Lackey)

APPENDIX

Recent Academic Information of Tsinghua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当代新闻传播与文化变迁研究

新浪微博中的在线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获得： 以国内新闻传播学学者的微博使用为例^①

Online Social Network and the Attainment of Social Capital in Sina Weibo: A Case Study of the Media Use of Scholars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徐煜^②

中文摘要：本研究运用数据挖掘与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探索了 110 名国内新闻传播学学者在新浪微博中建立起来的链接关系网络的微观结构形态及其内部互动机制，探讨了学者在微博空间中个体社会资本获得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闻传播学者在新浪微博中所构成的在线链接关系网络是一个相互连接较紧密同时也不存孤立点的网络，它具备将整个学术共同体成员凝聚为一个整体的能力。节点之间相互链接的比重占有所有链接关系的半数以上，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间平均只需通过一个联系人即可建立起联系。根据链接关系中不同的结构位置，还可以将整体网络进一步细分为 8 个不同的自反性子群。在学者线上社会资本获得的影响因素方面：第一，微博内容的使用强度与关系的使用强度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存在不同的效应，后者对两类线上社会资本的获得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前者仅对网络规模的大小产

^①康奈尔大学传播学系博士研究生廖望在数据挖掘上给予笔者很大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②徐煜：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生影响。第二，学者在线下的实际生活场景中所积累并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多，那么其在微博空间中所获得的社会资本也就越多，该结果证实了“富者越富假说”。

关键词：学术共同体，在线关系网络，社会资本，新浪微博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data mining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echniques, this paper was dedicated to examining the microscopic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s of the social networks formed by the micro-blogging hyperlink from the scholars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explored the possible factors which determined the attainment of scholars' personal social capital in Sina Weibo, including two specific media use and offline social capital.

Keywords: academic community, online social network, social capital, Sina Weibo

一、研究缘起

社交网站、微博、博客等各类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是 web 2.0 技术下的产物。与传统的互联网应用平台截然不同，社会化媒体有效地将信息传播和关系建构这两大要素融合在了一起。目前，微博在国内的用户规模已达 3.09 亿，其数值较 2011 年同时期净增长了 5873 万，已在数量上已经超越了社交网站（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3）。在这其中，新浪微博（<http://t.sina.com.cn>）是国内最大的微博服务平台，在短短的四年之内，其注册用户数已突破 5 亿人次。新浪微博的四大基本功能包括了发布、转发、关注、评论，用户可以发布 140 个字节以内的文字内容以及图片、文字、话题、表情、视频、音频等。

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各种微博产品在国内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已深入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有越来越多高校的学者选择试水微博并发表言论，他们已日益成为了微博中受人瞩目的关键用户。而在这其中，作为媒介技术最主要的关注者与研究者，国内新闻传播学术圈中的学者得风气之先，自然成为了微博空间中最活跃的高校学者群体。对于基于线上关系网络而形成的新型学术共同体，既有研究主要从社会互动方式、知识生产、机会流动等角度来关注该现象（刘锐，2011；徐硕，2012）。本研究则尝试运用数据挖掘与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来探索国内新闻传播学学者在新浪微博中所建立起来的链接关系的微观结构形态及其内部互动的机制，并同时探讨微博使用强度、线下既有的社会资本对学者在微博空间中个体社会资本的获得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网络社会：学术共同体社会网络的拓展与延伸

卡斯特所提出的“网络社会”（networked society）概念认为，网络已经构成了当今人类社会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形态，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则为网络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网络社会崛起的一大优点则是容许和生人形成弱纽带（weak ties），不论离线或在线，弱纽带扩张了社会交往，超出自我认知的社会界定之边界（卡斯特，2006：37），它重塑了整个社会的组织和联络的基本形式。

“科学共同体”、“无形学院”等概念常被用来阐释那些具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学术研究者

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联系。从传统意义上而言，学术社群中的传播网络包含真实世界网络中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及信息网络（information network），前者指的是正式的学术交流、学术合作和非正式的私人交往，后者则包含了基于学术论著的引用关系网络（citation-based network）和基于某一特定学术主题的词的关系网络（word-based networks）（Yan & Ding, 2012）。从网络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化媒体的诞生进一步拓展了学术共同体内社会交往的形式：微博中的关注功能（follow）即提供给学术社群内部成员一种新型的关系链接形式，巩固并延伸了学者间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国内外学者大多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探索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合著网络、引用网络的内部结构特征，并从“结构——行为”的视角来解释学者在这些网络中内部所处的结构位置是如何对他们的知识生产带来影响的（Burt, 1976; Breiger, 1978; 苏国贤、蔡国璋, 2003），但既有研究缺少进一步对社交媒体中学术共同体相互的链接关系网络的内部结构及其对行为的影响的探究。

结构（structure）一直以来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但长期以来，结构本身仅具有一种隐喻上的意义，因为微观的结构对研究者而言并不是直接可见的。然而，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技术的发展恰好为社会结构的属性提供了明细的陈述方式和精准的测量方法（Wasserman & Faust, 1994）。因此，本研究想探索的第一个问题是：

研究问题 1：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相关指标来看，新闻传播学者新浪微博账号的链接关系网络的基本形态、内部结构呈现出怎样的特征？不同学者所处的位置结构如何对他们的链接关系产生影响？

（二）微博使用强度、既有社会资本与在线社会资本的获得

1、新浪微博中學者的个体社会资本及其内涵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最早由布尔迪厄提出，它通常被用来描述个体通过体制化的社会网络中所能获得的实际与潜在资源的总和（Bourdieu, 1986），这些资源包括了社会关系和互动中所镶嵌的情感支持、接触多元想法、获得非冗余的信息等等（Ellison, et al., 2012）。Coleman（1988）则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结构性的资源”，个人、组织、社区以及整个社会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拥有社会资本，信任、同情和宽容则是形成积极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根据社会资本所指向的不同的公共或私人利益的诉求，现有文献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这两个维度，本研究所探讨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微观的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

对于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通常包含了以下两个维度：第一，结构性的个体社会资本，包括网络成员的社会网络规模、网络成员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如：中心位置、居间位置）等；第二，资源性的个体社会资本，包括对非正式网络途径的使用、社会网络中流动的可获得资源（赵延东、罗家德，2005；桂勇、骆天珏、黄荣贵，2013）。本研究将新浪微博中學者的个体社会资本主要分为个体的在线网络规模以及个体在微博学术共同体内的声望这两个方面。个体的在线网络规模被具体操作化为个人微博账号中的粉丝数量，它代表新浪微博中所有使用者对博主的整体态度，若全网中其他人对博主的关注程度越高，其个人的网络规模也就越大，暗含出博主在全网中可动员及获得他人资源的能力也就越强。个体在微博学术共同体内的声望则被具体操作化为博主在微博学术社群链接网络中的内向程度中心性的标准化值。程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经常被用以考察在社会网内部究竟谁是最为主要的中心人物。在有方向性的关系中，程度中心性还可具体分为外向程度中心性（out-degree centrality）和内向程度中心性（in-degree centrality），前者指一个节点承认对外关系数量的总和，后者指其他节点承认对某一节点有关系的数量总和（罗家德，2010：190-191）。在其

中，内向程度中心性常被用来判定行动者在网络中所拥有的声望和权力，其数值越高，代表个体在网络中越处于中心的位置（Wasserman & Faust, 1994: 129）。

2、微博使用强度与新浪微博中个体社会资本的获得

对于互联网使用是否有助于培育社会资本，既有研究提出了两种对立的观点：持社会资本失落说的研究者普遍认同时间替代假说（time displacement hypothesis），在他们看来，互联网使用会占据个人的时间，这使得个人用于与他人的面对面交流时间会减少，而后者对社会资本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网络使用会造成使用者与整体社会更加疏离（Kraut, et al., 1998; Putnam, 2000; Nie & Erbring, 2002）；持社会资本解放说的学者则认为，由于受益于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空间中的人际交往方式相比传统的面对面交流显得更为优越，它更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从而使社会资本得以增长（Katz, Rice & Aspden, 2001; Wellman, Haase & Hampton, 2002）。自以社交网站、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产生以后，相关的争辩还在一直持续中，不过现有的文献都更倾向于认为，社会化媒体不仅具备重塑社会网络的潜力，同时也降低了网络内部成员的沟通成本，更有利于使用者维系范围更大的异质性网络，因此，社会化媒体的使用将积极地帮助网络成员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Donath & Boyd, 2004; Ellison, et al., 2007）。由于社会化媒体融合了社会关系建构与信息内容生产这两个维度，而结合新浪微博的具体情境就可区分出两类新浪微博中所特有的使用类型：微博的关系使用和微博的内容使用，这两个指标可以被进一步操作化为微博的关注量与发表量，其数量的多寡体现出用户介入不同类型网络活动的强度。因此，基于现有文献的理论支持，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 1: 学者的微博关系使用强度（关注量）越高，其在微博空间中的个体社会资本（在线网络规模、微博学术共同体内的声望）也就越高。

研究假设 2: 学者的微博内容使用强度（发博量）越高，其在微博空间中的个体社会资本（在线网络规模、微博学术共同体内的声望）也就越高。

3、线下既有的社会资本与新浪微博中个体社会资本的获得

在个体社会资本获得的机制上，社会学家科尔曼与博特这一对师徒的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分歧。科尔曼强调了同质性的封闭网络对个体社会资本获得所带来的优势，因为闭合网络中的强连带可以带来社会与情感支持（Coleman, 1990）。博特则认为开放的跨越性网络更有利于个体获得社会资本，在这种异质性网络中，处在“桥”的位置的行动者可以获取更多的网络资源（Burt, 1992）。在以往针对以互联网为中介传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的研究中，有学者也提出了两类针锋相对的假说：“富者更富假说”（rich-get-rich hypothesis）与“社会补偿假说”（social compensation hypothesis）（Gosling, et al., 2011）。就微博空间中学者个体社会资本的获得而言，富者更富假说会倾向于认为，网络空间中的线上社会资本获得深受其在线下状态下既有的社会资本的影响，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再生产关系。而社会补偿假说就会认为，新媒介的产生本身具有一种技术赋权（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的效应，它将有助于打破既有的社会结构，那些在线下社会资本获得处于劣势的人将从新媒体空间内部数量更广泛的异质性网络中获得更大的资源回报。对于学术共同体中的学者而言，其在线下的社会资本主要来源于其在封闭学术圈内部所享有的声望及非正式影响力，它被操作化为学术共同体引用网络中的内向程度中心度。因此，本研究想要进一步探索的是：

研究问题 2: 学者在线下学术共同体中所获得的社会资本对其在新浪微博中的社会资本获得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富者更富假说与社会补偿假说哪一个更被支持？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的确定

结合 2009 年教育部学位中心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评估的数据排名，本研究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科实力最为顶尖的九所院校的十个新闻传播类学院中所有的在职学者界定为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社群的构成网络^①。现职学者的确定以 2012 年 12 月各高校学院网站中所提供的“师资介绍”、“研究人员”等资料为准，同时笔者还删除了在站的博士后及兼职教授。另外，鉴于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架构的特殊性，其下辖的国际文化系的研究者研究领域以文学、美学、政治学为主，与新闻传播学领域关系并不密切，因此笔者将其排除在外，仅保留该学院的新闻传播系、影视艺术与新媒体系的学者。按照此标准进行筛选和剔除，得到在在职的研究者共 427 名。

因此，本文将新浪微博空间中的新闻传播学术社群总体界定为这九所学校十个院系中使用新浪微博的在职研究者。确定对该社群网络边界的主要依据来源于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傅玉辉博士在 2012 年 1 月在其新浪微博账号中整理并汇总的名单^②。在此基础上，笔者还结合本人的微博使用经验和其他在校研究生提供的信息对该名单进行了补充，共得到 110 名在职研究者，这些学者同时也构成了本研究的分析单位。各高校中拥有新浪微博账号的学者人数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 16 名，中国传媒大学 14 名，复旦大学 12 名，清华大学 15 名，武汉大学 16 名，浙江大学 9 名，北京大学 12 名，南京大学 6 名，华中科技大学 10 名。

（二）研究方法 with 数据获得

本研究主要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来具体探究新浪微博中新闻传播学术社群的链接关系的结构性特征及其与社会资本获得之间的关联。为确保获得数据的信度，本研究主要运用了爬虫（Python）程序来进行数据挖掘（data mining），爬虫程序的运行时间是 2013 年 1 月 3 日，它抓取了 110 名学者之间的相互关注情况的信息，并由此构建出微博空间中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矩阵。在这个有方向性的二值矩阵中，链接行为的发出者被记录为 i ，接受者则为 j ，1 代表 i 对 j 的关注关系存在，0 则代表不存在这种关系。随后，研究者将该关系数据导入 UCINET6.0 进行计算，得出各节点在新浪微博链接网络中内向程度中心度数值。

而构成学者线上社会资本另一个维度的粉丝量，以及代表微博关系使用强度的关注量和微博内容使用强度的发博量，本研究同样运用了爬虫程序进行了相关数据的抓取。学者线下引用网络中的内向中心度数据（线下社会资本）则取自于 Xu（2013）的一项研究，其原始数值代表一个学者的论著被国内 366 名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术共同体中的研究者在 2002—2011 年这十年间所有发表在 CSSCI 论文中援引为参考文献的数量总和。同时，本研究还通过人工编码的方式获得了各节点的性别、职称、微博账号名称是否为真实姓名、微博账号是否加 V 认证等资料，以用于后续的数据分析。

四、数据分析与数据呈现

（一）新浪微博中的在线链接关系网络的结构分析

1、学者在线链接关系网络的基本形态

^①这九所高校的十个学院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②详见傅玉辉的新浪微博账号（<http://weibo.com/fuyh1970>）中 2012 年 1 月 16 日到 17 日间的发言记录。

图 1 是由 UCINET6.0 中 NetDraw 的可视化工具所绘制出的新浪微博中新闻传播学术社群的相互链接关系网络，箭头指向代表一个节点与另外一个节点的关注关系。从图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该线上链接网络是一个关联性网络，所有的 110 个节点都具备可达性（reachability），没有任何的孤立点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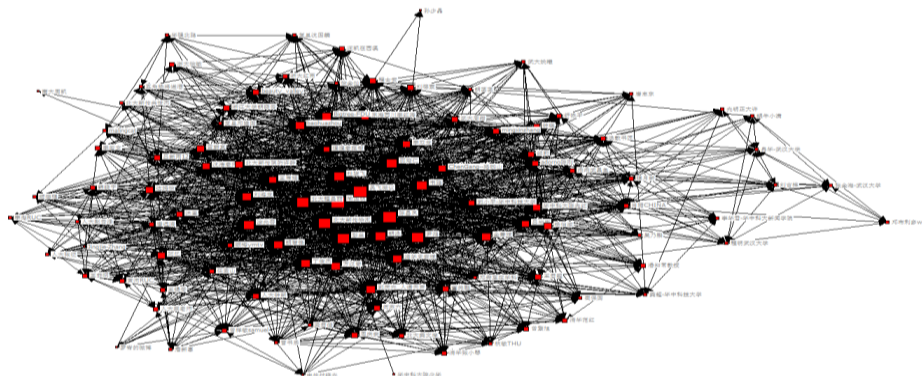


图 1：学者微博链接网络的结构可视化呈现

2、学者在线链接关系网络的内部结构及其对链接行为的影响

（1）关联性分析

关联性（connectedness）一般被定义为，如果一个集体成员间的社会关系把集体团结在一起，则该集体就具备关联性。就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而言，关联性与涂尔干（2000）所提出的“社会团结”概念紧密相关。以社会网络的角度来考察，不管是机械团结还是有机团结，都体现了行动者之间的关联性质（刘军，2009）。本研究对于学者链接网络的内部关联性分析包含以下三个维度：

首先，网络密度（network density）通常被用来衡量团体中成员关系的紧密与疏离程度，它在图形中被操作化为实际存在的线总数除以可能存在的线的总数。若以成员之间存在关注、被关注关系作为判别条件，该线上链接网络的密度为 0.320；若以成员之间存在相互关注关系作为判别条件，该线上链接网络的密度为 0.174。在存在关注、被关注的链接关系网络中，双方相互关注的比率是 54.27%。由于关注别人与被别人关注存在着时间先后，因此链接的产生并非是彼此独立的，由此可以看出互惠性关注行为在学者的微博链接网络中占据着较大比重。

其次，途径长度均值（the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代表了连接任何两个点之间最短途径的平均长度。研究发现，在这个 110 乘以 110 的矩阵中，距离为 1 的情况出现了 2590 次（占 25.4%），距离为 2 出现 7368 次（占 63.2%），距离为 3 出现 1264 次（占 10.8%），距离为 4 出现 74 次（0.6%），两个节点的平均距离为 1.867，这意味着全网中的任意两个节点之间平均只需要通过约一个联系人即可建立联系。

最后，聚类系数（clustering coefficient）的具体意义为，如果整体网络的群聚系数较高，则说明了社交网络中的信息传播网络更有可能联结成一个紧密的群体，节点之间所存在的结构洞就会更少。研究发现，该网络的局部密度和传递性聚类系数分别为 0.499 和 0.429，由此可以说明，新浪微博中的在线链接关系网络较具备将学术共同体成员聚集成一个整体的能力。

（2）角色位置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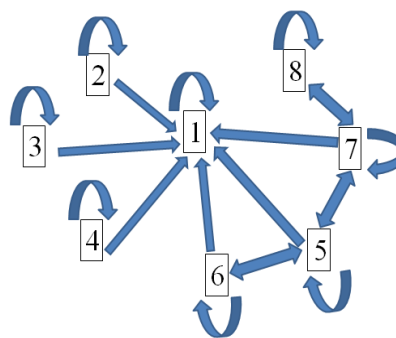
在社会学研究中，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最早使用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及其性质。延续着这种传统，不少学者也开始从社会中角色互动的角度来解释社会结构本身。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块模型（blockmodels）就是将社会结构看作是相互关联的角色系统（White, Boorman & Breiger, 1976），它可以根据结构等价（structural equivalent）来对行动者进行分类（Burt, 1992；刘军, 2009），其目的在于探索子群（subgroups）间相互互动的关系。本研究即选取了迭代相关收敛法的 CONCOR 程序进行块模型分析。经过多次迭代的计算过程，可以得出学者链接网络的 8 个不同子群，即确定出处于不同位置的网络成员。新浪微博链接网络的 8 个不同学者的子群的密度矩阵如下表一所示。根据网络整体密度 0.320，本文将密度矩阵表中大于该数值的改为 1，小于该数值的改为 0，得到像矩阵表二，其子群角色关系的简化形式如图 2 所示。

表一：学者微博链接网络的子群密度矩阵

	1	2	3	4	5	6	7	8
1	0.476	0.246	0.130	0.123	0.224	0.194	0.118	0.004
2	0.358	0.595	0.115	0.020	0.119	0.067	0.083	0.000
3	0.379	0.200	0.373	0.109	0.143	0.155	0.068	0.000
4	0.357	0.140	0.082	0.300	0.129	0.030	0.038	0.000
5	0.473	0.233	0.136	0.100	0.527	0.286	0.429	0.071
6	0.357	0.107	0.164	0.040	0.343	0.733	0.075	0.000
7	0.339	0.158	0.057	0.063	0.509	0.087	0.625	0.464
8	0.008	0.010	0.000	0.000	0.031	0.014	0.411	0.619

表二：学者微博链接网络的子群像矩阵图 2 学者微博链接网络的子群关系简化图

	1	2	3	4	5	6	7	8
1	1	0	0	0	0	0	0	0
2	1	1	0	0	0	0	0	0
3	1	0	1	0	0	0	0	0
4	1	0	0	1	0	0	0	0
5	1	0	0	0	1	1	1	0
6	1	0	0	0	1	1	0	0
7	1	0	0	0	1	0	1	1
8	0	0	0	0	0	0	1	1



通过对在线链接社群角色位置的结构分析可以发现，新浪微博中的学者在线链接网络的子群均为自反性子群（reflexive subgroups），即链接关系会出现在各自群体成员内部之间。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子群 1 在关注网络中受关注程度最高，它不仅受到除子群 8 以外的所有 6 个子群的关注，也是唯一不扮演发送者角色（transmitters）的子群。子群 5 与子群 6、子群 5 与子群 7、子群 7 与子群 8 相互之间还建立了互惠性的链接关系。另外，在子群间的对外连接中，子群 2、子群 3、子群 4 在全网中仅作为发送者而存在。

进一步发现，子群 1 由方汉奇、喻国明等 35 名学者构成，其成员全部来自于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的七所高校。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来自子群 1 的学者其内向程度中心度

值的均值为 38.79，它代表每个子群成员的微博约被全网中的 39 个其它学者所关注，而非该子群的学者其均值为 18.09，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 < 0.001$ ）。而较为孤立的子群 8 中的 7 名成员则均来自于武汉大学，唯一与子群 8 形成互惠关系的子群 7 成员（8 人）均源于武汉的两所高校。子群 2（15 人）、子群 3（11 人）、子群 4（10 人）、子群 6（10 人）中的各自成员同质化程度较强，从整体上来看，它们分别对应的是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这四校的学者。武汉和浙江的三所高校的学者则构成了子群 5（14 人）的主要成员，显示出该子群较强的异质性。

（二）在线社会资本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运用 STATA12.0 对两类社会资本的获得进行了 OLS 回归分析。为使预测模型的因变量残差不存在异方差性的问题，本研究采用了稳健式（robust）的回归方法。模型中的粉丝数、在线链接网络中的内向程度中心度数值、线下引用网络中的内向中心度数值在引入回归方程前分别经过了对数赋值或标准化赋值等方式的处理，回归的结果如表三、表四所示：

表三：预测个人网络规模（粉丝量）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N=110）

	因变量：网络规模（粉丝数）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第一层：控制变量				
性别（0=女）	-0.061	-0.075	-0.076	-0.100 ⁺
职称（0=讲师）：教授	0.636***	0.593***	0.431***	0.258**
职称（0=讲师）：副教授	0.281**	0.254***	0.224**	0.145*
微博账号名称是否为真实姓名	-0.094	-0.058	0.000	-0.020
微博账号是否加 V 认证	0.162*	0.141*	0.135*	0.126**
第二层：微博使用强度				
微博内容的使用强度（微博数）		0.233*	0.265**	0.170**
微博关系的使用强度（关注数）		0.211*	0.178*	0.013
第三层：学术共同体中的既有社会资本				
线下引用网络中的内向程度中心度			0.342***	0.145 ⁺
第四层：微博链接网络中的社会资本				
在线链接网络中的内向程度中心度				0.520***
增加的 R^2 （%）	33.7	13.9	9.4	12.7
总的 R^2 （%）	33.7	47.6	57.0	69.7

a. 此表内数字为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后的标准化系数 β ；

b. 因变量网络规模是经过原始数据处理后再取对数的赋值，自变量引用网络中的内向程度中心度、微博链接网络中的内向程度中心度均为 UCINET6.0 中生成的标准化值；

c. ⁺ $p < .10$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四：预测个人线上链接网络中的内向程度中心度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N=110）

	因变量：在线链接网络中的内向程度中心度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第一层：控制变量				
性别（0=女）	0.068	0.047	0.047	0.089
职称（0=讲师）：教授	0.562***	0.513***	0.332***	0.088
职称（0=讲师）：副教授	0.210*	0.184**	0.151*	0.024
微博账号名称是否为真实姓名	-0.033	-0.026	0.039	0.039
微博账号是否加 V 认证	0.036	0.025	0.018	-0.059
第二层：微博使用强度				
微博内容的使用强度（微博数）		0.148	0.183 ⁺	0.034
微博关系的使用强度（关注数）		0.353***	0.315**	0.215**
第三层：学术共同体中的既有社会资本				
线下引用网络中的内向程度中心度			0.380***	0.186*
第四层：微博链接网络中的社会资本				
网络规模（粉丝数）				0.567***
增加的 R^2 （%）	22.6	19.0	11.6	13.8
总的 R^2 （%）	22.6	41.6	53.2	67.0

a. 此表内数字为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后的标准化系数 β ；

b. 因变量线上链接网络中的内向程度中心度、自变量线下引用网络中的内向程度中心度均为 UCINET6.0 中生成的标准化值，自变量网络规模是经过原始数据处理后再取对数的赋值；

c. ⁺ $p < .10$ ，* $p < .05$ ，** $p < .01$ ，*** $p < .001$

研究发现，首先，从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相对于讲师而言，身为教授、副教授的学者，其个人微博会拥有更多的粉丝数，其在链接网络中的内向程度中心度也会越高；加 V 认证的微博账号仅对粉丝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就微博使用强度与在线社会资本获得的关系而言，微博内容的使用强度仅对在线网络规模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微博关系的使用强度则均显著地有助于这两类社会资本的积累。由此可见，微博的不同使用行为对社会资本的获得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与假设 1 的表述稍有出入，因此研究假设 1 被部分验证，研究假设 2 则被全部验证。再次，学者在线下学术共同体所获得的社会资本对其线上的粉丝数量及其在链接网络中的内向程度中心度均具有显著正向的预测力（ $p < .001$ ），暗含出这 110 名学者在微博空间中所获得的社会资本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在线下既有的学术圈封闭网络中所享有的个人声望所决定的，该结果显然更支持了“富者越富假说”，问题 2 被得到回答。最后，这两类在线社会资本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联性（ $p < .001$ ），是互为因果关系的。

五、讨论与结语

研究发现，新闻传播学者在新浪微博中所构成的在线链接关系网络是一个相互连接较紧密同时也不存孤立点的网络，它具备将整个学术共同体成员凝聚为一个整体的能力。节点之间相互链接的比重占有所有链接关系的半数以上，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间平均只需通过一个联

系人即可建立起联系。与此同时，根据链接关系中不同的结构位置，还可以将整体网络细分为 8 个不同的自反性子群。相较于其它子群，子群 1 的成员（由 35 名学者构成）往往会更多受到整体网中其他成员的关注链接。而在学者线上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方面：第一，微博内容的使用强度与关系的使用强度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存在不同的效应，后者对两类线上社会资本获得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前者仅对网络规模的大小产生影响。该结果暗示了用户在网络中不同的特定使用行为将会对社会资本造成不同影响，因此，若要解决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关系的争论，则有必要深入地理清不同网络使用行为的影响机制（Ellison, et al., 2011；桂勇、骆天珏、黄荣贵，2013）；第二，正如“富者越富假说”所揭示的那样，个体线上社会资本的获得深受线下既有社会资本的影响，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再生产关系。回归方程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观点，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学者在线下的实际生活场景中所积累并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多，那么其在微博空间中所获得的社会资本也就越多。

本研究的主要缺陷及后续研究的可能性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整体网研究的边界是否准确将直接决定了研究的效度，一方面，本研究对于新闻传播学术共同体的线上链接网络的考察仅限于国内九所高校中十个学院中拥有微博账号的学者，有必要将更多来自于其它高校的学者纳入研究对象；另一方面，由于对拥有微博账号的学者的确定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他人总结与个人经验补充，因此本研究极有可能会遗漏来源于上述九所高校中十个学院的其他学者的微博账号从而会产生偏误。第二，微博上学者间的链接网络并不能完全包含线上关系的全部内涵，包括讨论网（通过回复功能实现）、转发网（通过转发功能实现）、推送网（通过@功能实现）在内的其它线上关系网络有待今后研究者的进一步关注。第三，本研究对于个体线上社会资本与线下社会资本的操作化定义主要指的是结构性的个体社会资本，对资源性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有待后续的补充；同时，今后的研究也可尝试探究微博使用与学术共同体中集体社会资本之间的关联性。

参考文献：

- 埃米尔·涂尔干，渠东译.（2010）.《社会分工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黄荣贵、骆天珏、桂勇.（2013）.《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一项基于上网活动的实证研究》.《江海学刊》，(1): 227-233.
- 刘军.（2009）.《整体网分析讲义》.上海：格致出版社.
- 刘锐.（2011）.《从差序格局到团体互动：新浪微博空间中的知识生产与机会流动》，第五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北京：中国传媒大学.
- 罗家德.（2010）.《社会网分析讲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曼纽尔·卡斯特，夏铸九、王志弘等译.（2006）.《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苏国贤，蔡国璋.（2003）.《社会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台湾社会学者的隐形学群》.发表于 2003 年台湾社会学年会暨“迈向新世纪的公平社会——社群、风险与不平等”研讨会.
- 徐硕.（2012）.《传播学学者在微博中的知识生产现状分析——基于传播学学者新浪微博内容分析》.《东南传播》，(6): 69-71.

- 赵延东, 罗家德. (2005). 《如何测量社会资本: 一个经验研究综述》. 《国外社会科学》, (2):18-24.
-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 (2013). 《第 3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取自: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301/t20130115_38508.htm.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241-258). CT: Greenwood Press.
- Breiger, R. L. (1976). Career attributes and network structure: A blockmodel study of a biomedical research special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 117-135.
- Burt, R.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95-120.
-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onath, J.S., & Boyd, D. (2004). Public displays of connection. *BT Technology Journal*, 22(4): 71-82.
- Ellison, N.B., Steinfield, C. & Lampe, C. (2007).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the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 1143-1168.
- Ellison, N.B., Steinfield, C. & Lampe, C. (2011). Connection strategies: social capital implications of Facebook-enabled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New Media & Society*, 13(6), 873-892.
- Gosling, S. D., Augustine, A. A., Vazire, S., Holtzman, N., & Gaddis, S. (2011). Manifestations of personality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Self-reported Facebook-related behaviors and observable profile information.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4(9): 483-488.
- Katz, J. & Aspden, P. (2001). The Internet, 1995-2000: Access, civic involvement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merican Behavior Scientists*, 45(3): 405-419.
- Kraut, R. E., Patterson, M., Lundmark, V., Kiesler, S., Mukopadhyay, T., & Scherlis, W. (1998). Internet paradox: A social technology that reduces social invol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3(9): 1017-1031.
- Nie, N. & Erbring, L. (2002). Internet and society: A preliminary report. *IT & Society*, 1(1):

275-283.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Y: Simon & Schuster.

Wasserman, S., & Faust, K. (1994).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llman, B., Haase, A. Q., Witte, J., & Hampton, K. (2001). Does the Internet increase, decrease, or supplement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commitmen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5(3), 436-445.

White, H. C., Boorman, S. A., & Brieger, R. L. (1976). Social structure from multiple networks. I . Blockmodels of roles and pos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4), 730-799.

Xu, Y. (2013). An author-level analysi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cademic community in mainland China: A new perspective from social network the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3 IAMCR Conference*. Ireland, Dublin: Dublin City University.

Yan, E., & Ding, Y. (2012). Scholarly network similarities: how bibliographic coupling networks, citation networks, cocitation networks, topical networks, coauthorship networks, and coword networks relate to each oth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3(7): 1313-1326.

当代新闻传播与文化变迁研究

从温州动车事故看中国新闻实践与 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

The Game Between Journalistic Practice and Political Control:A Case Study on Wenzhou Train Collision Accident

高晴^①

中文摘要：本文以 2011 年 7 月 23 日发生的温州动车事故为例，通过内容分析、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法，考察中国媒体及其从业者在新闻实践中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研究发现，此次动车事故中，中央及地方新闻主管部门通过统一安排住宿并进行信息登记、点名召回记者、发布新闻指令等方式对媒体报导进行管控与引导，而媒体及其从业者则采取远离官方的现场干预、抢先报导、隐藏文本、新媒体发布等形式避免政治管控，争取最大限度地对动车事故进行反思性报导与问责。

关键词：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国传媒，新闻实践，政治权力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game between journalistic practice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China through a case study on Wenzhou train collision accident. The research employed the “content analysis”, “in-depth interview” and “textual analysis” as its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during the Wenzhou train collision accident,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controlled and guided journalistic practice by means of assigning specific accommodation and information registration, recalling journalists, issuing media directives etc, affecting media’s reports to varying degrees. And media and its practitioners used avoiding the on-site control, reporting ahead of directives, using hidden transcript and releasing news through new media as resistance strategies to fight for truth and reflection.

^①高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研究生。

Keywords: Wenzhou train collision accident, Chinese media, journalistic practice, political control

一、研究动机

“党管媒体”是中国媒体制度的一大特征。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媒体及其从业者不得不在政府的干预之下进行新闻实践。不少人将中国媒体人看作是在“戴着镣铐跳舞”。然而政治能控制新闻，但又无法抹杀新闻本身所具有的规律性（田中初，2005）。新闻从业者拥有自己的主体意识，新闻专业主义也越来越成为中国媒体从业者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在新闻事件中，行政命令等政治干预不可避免的会与媒体人的新闻实践发生冲突，如要更好的了解中国媒体的运作机制，对这个博弈过程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于 2011 年 7 月 23 日晚，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 D301 次列车由后方与开往福州南站的 D3115 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D301 次列车四节车厢从桥上坠下，共造成 40 人死亡、172 人受伤。事故发生后一周内，中国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大量的追踪报导，报导内容包括对事发过程的还原、对事故原因的追问、对有关部门责任的追究以及对铁道部甚至铁路体制的批判等。同时，与部分媒体激烈的批判和问责相伴随的，是官方宣传部门接二连三的召回记者、不许反思、不许问责等行政命令。

一面是民众要求知道真相并进行问责的强烈呼声，一面是接连不断的政治命令，新闻实践与政治权力之间经历了怎样的互动？这是本文主要想探究的内容。

二、文献综述

（一）新闻实践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我国现行新闻体制的建立，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战争中利用新闻媒体作为政治宣传工具以及在 1949 年后对前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摹仿（田中初，2005）。这种新闻体制的特点是认为媒体是正当领导人民、控制信息的工具（孙旭培，1993），“党管媒体”成为不可撼动的基本原则，因而媒体从业者在新闻实践中常常面临着各种形式的政治干预。

陈力丹在 1988 年提出，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中国新闻界形成了“对表意识”，即新闻界具有心领神会、闻风而动的机制，可以保证将每一点指示贯彻到连当事人都会惊讶的地步，而今天，这种对表意识不但没有弱化，反而更加自觉和强化（陈力丹，2008）。

陆晔、潘忠党（2002）认为，虽然政治干预与新闻实践的冲突时有发生，整顿、触雷等现象也常见，但是二者之间更多的还是新闻生产的常规性活动，为了确保新闻活动的顺利进行，党国主管与新闻从业者采取“上下合作”的方式（潘忠党，1997；陈怀林，1999）。

关于媒体从业者具体如何应对政治控制，王毓莉（2010）采用 James C. Scott 与 Michel Foucault 关于“权利”与“反抗”的论述并提出，面对无法抵抗的新闻指令，新闻工作者常常透过时空转换、责任转移、报导事实、合纵连横、反客为主、钻研漏洞等隐藏文本的抗争策略，期望争取更大的新闻专业空间。

（二）灾难新闻及其报导

灾难新闻即媒体关于天灾人祸事件的报导。由于其威胁人类生命的特点，灾难新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最受人类关注的新闻，因而对于新闻从业者而言，灾难事件往往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然而在中国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他们对于灾难新闻的报导似乎并不理想，某些灾难新闻甚至被冠以“敏感区”、“雷区”、“禁区”等标签（田中初，2005），因而他们的报导常常无法满足受众对于灾难信息的需求。

孙发友（2001）认为，我国灾难新闻的报导观念以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灾难报导的主要特点是以“人”为本位，追求的是一种教化层面的意义，后阶段则转向以“事”为本位，追求的是信息层面的价值。

沈正赋（2002）在《我国灾难新闻报导理念、机制与方法的嬗变》一文中提出，建国以来我国新闻媒体对于灾难性事件的报导大体经历了从“不报”到“少报”再到“如何报导”三个发展阶段，报导特征上长期保持着三多三少的倾向，即“多正面报导，少侧面报导；多报导领导，少报导群众；多关注群体，少关注个体”。（田中初，2005）

三、研究问题

温州动车事故发生以后，大多数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连续一周的跟踪报导，并针对铁道部过早停止救援以及掩埋车头等不当行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和批评，用词之激烈程度超出以往对许多事件的报导。因此，本文试图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探究此次事件中新闻实践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 1、媒体在此次事件中受到了哪些来自政府的政治干预？
- 2、这些干预对媒体的报导有何影响？
- 3、面对这些政治干预，媒体及其从业人员采取了哪些措施与之进行博弈？

四、研究方法

为增强本研究的代表性，本文选择了此次事件中问责意识较为强烈、被认为最为敢言的两家报纸——《南方都市报》和《经济观察报》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深度访谈法和文本分析法进行探究。

（一）内容分析法：笔者通过慧科电子新闻库，以“温州动车事故”为关键词，检索出《南方都市报》、《经济观察报》的相关报导，对两家报纸7月23日至8月1日之间与动车事故相关的报导进行内容分析。

（二）深度访谈法：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报导背后的博弈，笔者对《南方都市报》和《经济观察报》七位相关记者及编辑进行了半小时至一个半小时不等的面对面或电话访谈。此次受访者列表见表1，出于部分受访者的要求，在此隐去所有受访者的姓名及具体职位，仅以编号与职业呈现。

（三）文本分析法：考虑到由于访谈涉及内容较为敏感，部分受访者出于戒心可能会对部分内容有所保留，因此笔者还收集了有关此次事件中政治干预的媒体报导和部分记者、编辑以及学者等所发布的关于此事的微博、博客内容，试图从更全面的角度看待此次事件。

表1：深度访谈对象一览表

访谈对象 (按访谈时间顺序)	职业	访谈日期	访谈形式
1号 (S1)	《南方都市报》记者	2013.4.2	面对面访谈
2号 (S2)	《南方都市报》记者	2013.4.2	面对面访谈
3号 (S3)	《南方都市报》编辑	2013.4.3	面对面访谈
4号 (S4)	《南方都市报》编辑	2013.4.3	面对面访谈
5号 (S5)	《南方都市报》编辑	2013.4.3	面对面访谈
6号 (S6)	《南方都市报》审读员	2013.4.3	面对面访谈
7号 (S7)	《经济观察报》记者	2013.4.23	电话访谈

五、研究发现

（一）温州动车事故中的政治干预

由于灾难的爆发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灾难的处理涉及资源的重新分配，这些都使得灾难变得更加政治化（田中初，2005），因此灾难事件爆发后，政府势必会对新闻媒体进行管制和引导，使其向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进行报导。通过深度访谈及对相关资料的文本分析，笔者发现，在此次动车事故中，新闻主管部门采取了以下调控方式：

1、指定住宿地点，进行信息登记

由于事故发生于7月23日夜晚八时以后，且发生地点较为偏僻，交通非常不便，所以除个别距离较近的媒体外，多数记者都是第二天即7月24号才到达现场。记者们到达现场后会被当地宣传部门统一安排到指定酒店入住，并进行信息登记（S7）。此外，在采访现场，温州市宣传部门曾派人以“协助采访”为名，请各地记者留下服务机构和姓名（苹果日报，2011）。

通过以上各种方式，当地宣传部门掌握了现场所有登记记者的信息，从而为其下一步点名召回要求记者做了准备。

2、点名要求召回记者

7月24日下午铁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有多家派出记者参加上述发布会的媒体都收到中宣部的电话，要求召回记者。

首先，官方通过这场发布会的签到名单，收集出席记者名单与从业媒体，并上报中宣部相关部门。随后，中宣部官员打电话给报社的主管单位，点名要求召回记者（曹国星，2011）。例如当天广东省委宣传部所发出的通知内容如下：目前，在温州火车出轨事故现场采访的我省媒体记者有：羊城晚报（夏杨等2人）、南方电视台（徐静、姚宏等两组5人）广州日报（邱伟荣等2人）等等（略）。请速撤回记者（曹国星，2011）。

3、发布新闻指令，要求只得发布正面报导和权威部门消息

7月29日晚间，中宣部九时后通过手机短信连下三道指令，其中一条指令内容如下：

鉴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境内外輿情趋于复杂，各地方媒体包括子报刊及所属新闻网站对事故相关报导要迅速降温，除正面报导和权威部门发布的动态消息之外，不再做任何报导，不发任何评论。网络新闻方面也收到指令。根据29日深夜微博上流传的一则通知（中国时报，2011）：

有关温州动车事故所有稿件，各网站立即压至后台，首页一条也不许留，不得刊发任何评论。论坛、博客、微博不得推荐相关话题……不符合今天下午通知要求的贴文、博文、微博要坚决删除……

（二）官方政治干预对媒体报导的影响

由于指令发自晚上九点多，许多报纸的内容此时已基本定稿并准备印刷，因此接到命令后，大批媒体不得不大范围撤版并寻找新内容对版面进行填充。例如《新京报》将原本的头版报道改为报道北京暴雨，而报道动车事故的《逝者》等4个版面撤下，减为1版新华社通稿；《21世纪经济报导》撤换八个版；《中国经营报》八个；《华商报》撤三版评论等（明报，2011）。而在网络方面，当天晚间，动车事故的新闻和专题也淡出新浪、搜狐、网易、凤凰等主要门户网站的新闻页面的首页。

笔者将《南方都市报》7月24日至7月31日有关动车事故的社论及批评、问责类文章进行整理对比后发现，7月29日前后，该报关于温州动车事故的报导内容（见表2）和数量（见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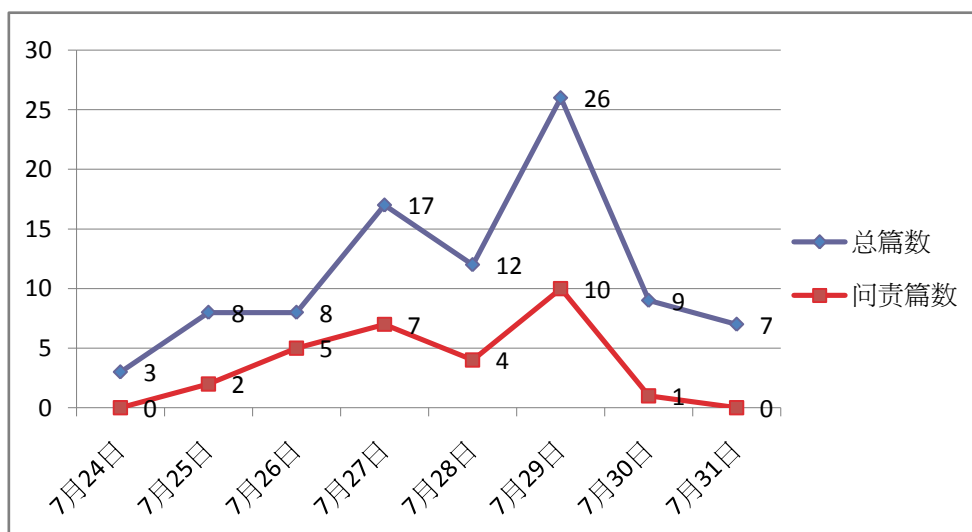
3) 均有明显变化。

表 2: 《南方都市报》7 月 24 日至 31 日有关动车事故的部分报导

时间	社论	批评及问责类文章
2011.07.24		《雷暴“劈停”动车为何避不开追尾》
2011.07.25	《动车温州追尾事故，直面公众质疑需要彻底》	《铁路体制改革没有借口再拖延》
2011.07.26	《检讨动车追尾事故，亟需矫正的是权力惯性》	《若真不堪一“击”，就请停运整顿》 《动车荒唐追尾三问出事原因》 《不会愤怒的人，将会悲伤》
2011.07.27	《恢复秩序高于抢救生命，是令人心寒的价值莽断》	《全国人大应介入动车追尾事故调查》 《我们该怎样寻找动车追尾事故真相》 《削减铁道部预算，用于赔偿伤亡者》 《“早签协议奖”还有人性吗？》
2011.07.28	《谈判格局不对等，霸道赔偿谈何抚慰人心》	《铁路事故应急处置机制亟待完善》 《铁轨上下，命比纸薄》
2011.07.29	《痛悼遇难者，叩问责任人》	《为什么高铁频频被雷倒？》 《天灾之外，人祸又有几分？》 《铁道部为何急于恢复通车？》 《高铁抢速度，技术过关没？》 《脱节的赔偿》 《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
2011.07.30	《税收适当让利于民方是高明之举》	《事故教训应以改革诚意弥补》
2011.07.31	《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的地铁信号故障》	《让公布遇难者名单成为制度》

由表2可以看出，7月25日至29日，《南方都市报》不论是社论还是相关评论，其问责、批判意识都较为强烈，而至30日，社论主题完全变更，31日社论内容变更为上海地铁四号线发生地铁信号故障，文章不再是直接针对温州动车事故。

表3: 南方都市报7月24日至7月31日动车相关报导数量表



由表3可以看出，7月24日至29日期间，南都关于动车的报导整体呈上升趋势，并在29日达到最高峰，而至30日，分别迅速下降为9篇和1篇。

虽然多数媒体如《南方都市报》一样，受到了此次指令的直接影响，选择撤版、换版等形式遵从，但仍有少数媒体，如《经济观察报》，似乎并未受到影响。7月29日，即指令下达当天，该报关于动车事故的《温州没有奇迹》特刊发布于其网站上，并于8月1日如期发行纸质版。

表4:《经济观察报》8月1日动车事故《温州没有奇迹》特刊部份内容

封面图片	分拆铁道部		01 版
头版（要闻）	伊伊，等你长大的时候		01 版
来论	高铁没有经济学		08 版
	温总理温州记者会讲话深意		
特别报导 温州没有奇迹	头版	“分拆铁道部”猜想	09 版
	现场	温州七日记	10 版
	调查	谁是真凶	13 版
		这完全是人祸	
		正常行驶是怎样的	
	评论	通号集团的生死大事	14 版
		2%强制险 60 年不变百亿保费去向成谜	
	评论	铁道部在掩饰什么（事故起因）	15、16 版
		请敬畏生命（现场抢救）	
		铁道部还是铁心部（善后赔偿）	
铁道部错位（体制追问）			
	全国人大应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特别调查）		

数据源：童璐、姜彩杰（2012）

由表 4 可以看出，尽管 29 日晚间中宣部下达三道指令，《经济观察报》仍然以较为激烈的言辞对动车事故进行反思性报导和问责，似乎丝毫不受其影响。

还有一些媒体则采取较为缓和的方式，例如上海团市委下属的都市报《青年报》则以近乎开天窗的形式，登了只有温家宝日前在事故现场献花鞠躬的图片，以及出事动车 D301 和 D3115 两个编号，最下边则是一行小字：2011 年 7 月 23 日 20:34，即车祸出事时间（曹国星，2011）。

三、媒体及其从业者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

虽然政治控制渗透于新闻实践的各个角落，但这并不代表这种控制是“铁板一块”（S3）。新闻记者在面对权力支配时，常常主动适应，透过临场发挥或报导资源，来达到抗拒的目的，而非一味的退让（田中初，2005）。

根据笔者的采访和观察，新闻从业者在此次事件中采用了以下“擦边球”的策略。

（一）避开官方的现场控制

在事故发生现场，当地的宣传部门会通过统一安排住宿、进行信息登记等形式对记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为了避免这些控制，部份记者会刻意避开官方所管控的范围。

例如 4 号受访者，由于事先已预料到宣传部门会对其报导进行干预，他直接远离官方指定的住宿地点，这样既可以不透露自己的信息，又不用随时受到官方的命令和干预。

还有一些在现场的记者选择登记虚假信息，例如当温州市宣传部门派人以“协助采访”为名，请各地记者留下服务机构和姓名时，有记者故意虚构了机构名称（苹果日报，2011）。

（二）抢先报导

由于灾难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新闻主管部门有时难以很快做出反应，在相关的报导口径下达到各新闻单位之前，具体的报导控制并不存在，这就给抢发新闻提供了机会。

7 月 29 日为动车事故头七纪念日，南方都市报于当天即推出了《真相是最好的纪念》特刊，而就在当天晚上，中宣部就正式下达了只允许进行正面报导的命令。与大多数准备第二天纪念头七、接到指令后不得不疯狂撤版的媒体相比，南方都市报可以说是成功“逃过一劫”。4 号受访者告诉笔者，他们这样做正是考虑到指令随时可能下达，所以要将特刊尽可能早的发布。

（三）隐藏文本

“隐藏文本”这一概念由 James C. Scott 于 1990 年在其关于农民反抗的著作《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中提出，原意是指被支配者发生在幕后的、权利所有者无法直接观察到的论述与行动。笔者此处将此概念具化为，媒体从业者为了抵抗政治控制而采取的影射、暗喻等较隐晦、委婉的言语和表达形式来达到其目的的行为。

7 月 30 日，即指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新京报彻掉原本关于动车事故的版面，将头版改为北京暴雨，标题为《七日雨未绝，一天两预警》。实名认证微博的《新京报》执行总编辑王跃春公开承认，这是在借用气象新闻来“指桑骂槐”，暗指中宣部在事故发生次日两度下发新闻指令，以及在事故发生第七天再度进行管制（陈宇，2011）。

7 月 31 号，南方都市报的社论标题为《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的地铁信号故障》，内容是 7 月 28 日上海地铁 10 号线列车因信号故障开错方向，由于信号故障一直被认为是导致温州动车追尾的主要原因，加之文中不时提到温州动车事故，因此可以推断，这篇社论实际上是以上海地铁信号故障影射温州动车事故。

（四）新媒体，新渠道

以微博为主的新媒体平台出现以后，迅速弥补了传统媒体审核严格的缺点，成为包括新闻从业者在内的众多网民发布信息、表达观点的场所。此次温州动车事故也不例外。29 日指令下达后，不少媒体被迫撤版，许多记者将其无法见报的稿件通过新媒体，尤其是新浪微博，刊登出来，得到了大量的响应和转发。

例如，《新京报》一名编辑在微博上解释被撤版的过程：“一分钟前接到消息，我的版最终也没坚持到与读者见面，新京报坚持又坚持、妥协又妥协之后，仅存的四个版也被和谐。长歌当哭，没办法，我们要为 2000 多个新京报员工的饭碗考虑。贴版，以示纪念，注意标题。”

1 号受访者也采用化名的形式将其一篇无法在报纸上刊登的报导通过其博客发表，并发布相关微博：

“在这样的重大事件面前，在报纸上争取舆论空间几乎是做不到的，毕竟一篇报导是否见报不是由一个记者或一个编辑能够决定的，各层领导都会对内容进行审查。但微博的审核没有那么严格，所以记者就可以把很多报纸上无法呈现的内容发布出来”（S2）。

四、结论与建议

行文至此，笔者针对本文提出的关于此次事故的三个研究问题，分别作如下总结：

首先，在此次动车事故中，中央及当地宣传部门分别采取了统一安排住宿并进行信息登记、点名召回记者以及发布新闻指令等形式对媒体及其从业者进行干预和引导。

其次，面对这些政治控制，部分记者接到召回命令之后选择撤回，但其他记者则坚持留在现场。而面对中宣部下达的新闻指令，多数媒体不得不以撤版、换版等形式对进行服从，但仍有《经济观察报》、上海《青年报》等媒体以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抗命”报导。

最后，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报导自由和专业主义，媒体及其从业者采取了避开官方控制现场、抢先报导、隐藏文本以及新媒体平台发布等方式，与政治控制进行博弈。

新闻管制作为一个敏感话题，其数据收集、采访工作较为困难。由于受访者与笔者并不熟悉，因此难免会有所保留，这些因素导致本文所呈现的只是部份事实，而无法将事件更为全面的面貌展现出来。总之，虽然 1978 年以后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媒体市场化运作、新媒体发展等进步，但我国的政治结构决定了中国媒体不可能像美国等西方媒体那样享有最大程度的舆论空间，政治干预依然渗透于新闻实践的每个角落，媒体从业者依然需要“戴着镣铐跳舞”。

参考文献：

曹国星：《中宣部令媒体召回采访动车事故记者》，取自：

<http://www.chinese.rfi.fr/%E4%B8%AD%E5%9B%BD/20110725-%E4%B8%AD%E5%AE%A3%E9%83%A8%E4%BB%A4%E5%AA%92%E4%BD%93%E5%8F%AC%E5%9B%9E%E9%87%87%E8%AE%BF%E6%B8%A9%E5%B7%9E%E5%8A%A8%E8%BD%A6%E4%BA%8B%E6%95%85%E8%AE%B0%E8%80%85>，2011-07-30。

陈力丹：《反思与展望：中国传媒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笔谈》，载《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6）：17~48 页。

陈宇：《中国传媒的社会运动倾向：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为例》，台湾，“2012 年中华传播学会”宣讲论文。

《中宣部下指令内地报道大缩减》，载《明报》，2011-07-31，取自：

http://mediamobserver.blogspot.hk/2011_07_01_archive.html。

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3）。

潘忠党：《序言：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载《传播与社会学刊》（6），1~16 页。

《采访手记：悲剧当喜剧，温州上演慈善骚》，载《苹果日报》，2011-07-27，取自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10727/15468223>。

钱钢：《中国传媒与政治改革》，香港：天地图书，2008。

钱刚：《动车事故报导与中国传媒的突破》，载《传媒透视》，2011（8）。

孙旭培：《新闻学新论》，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93。

孙五三：《批评报到作为治理技术——市场转型期媒介的政治-社会运作机制》，见《新闻与传播评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田中初：《新闻实践与政治控制：以当代中国灾难新闻为视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童璐、姜彩杰：《新财经媒体的舆论监督：由经济观察报的<分拆铁道部>谈起》，载《东南传播》，2012（8）。

李金铨：《大众传播理论》，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96。

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载《新闻学研究》（台湾），2002（4）。

王毓莉：《驯服 VS 抗拒：中国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新闻专业抗争策略》，载《新闻学研究》（台湾），2012（1）。

魏武挥：《微博上的记者》，载《21 世纪经济报导》，2011-07-29。

张洁平：《中国媒体集体抗命寻失踪真相》，载《亚洲周刊》，2011（32）。

《和谐号角响温州动车案陆媒噤声》，载《中国时报》，2011-07-31，取自：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10184。

《中宣部连下指令陆媒最长一夜》。载《中国时报》，2011-07-31，取自：
<http://www.liarking.com/n/%E4%B8%AD%E5%AE%A3%E9%83%A8%E9%80%A3%E4%B8%8B%E7%A6%81%E4%BB%A4-%E9%99%B8%E5%AA%92%E6%9C%80%E9%95%B7%E4%B8%80%E5%A4%9C%E3%80%9020110731%E3%80%91>。

Lee, Chin-Chuan (1990). *Mass Media: of China, about China*. In Chin-ChuanLee(Eds.),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P.03-P29).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Lee, Chin-Chuan(2004). The Concept of Chinese Journalists: Ideological Covergence and Contestation, *Perspectives: Working Papers in English & Communication*, 16(1) Spring 2004

Scott, J.C.(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Zhao, Yuezhi(2008)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Plymouth, UK: Rowman& Littlefield.

当代新闻传播与文化变迁研究

初探小报新闻读者的公民参与程度 ——以《苹果日报》读者为例

The Degree of the Tabloid Readers' Civil Engagement: A Case Study on the Readers of *Apple Daily* in Taiwan

吕嘉薰^①

中文摘要：本研究旨在厘清台湾小报新闻读者的阅报倾向，以《苹果日报》的读者为例，探究阅报内容偏向（软性 / 硬性）对其涉入公共事务、政治知识高低的影响，同时比较了偏好阅读软性新闻的读者和偏好硬性新闻的读者，在公民参与程度、政治知识表现上的差异。本研究采问卷调查法，研究结果显示：阅报内容偏向软性新闻的读者，其公民参与程度不一定越低，亦不一定较缺乏政治知识、软性新闻的偏向程度，跟是否常投入公共事务、了解政治事实不相关。反观偏向硬性新闻读者，其偏向程度越高，公民参与程度越高，但不能说越常看硬性新闻，越清楚政治信息，两者间没有关联。此外，我们无法假设阅报内容偏向软性新闻的读者对娱乐版之外的新闻内容没有兴趣。最后，研究加测了阅报时间长短与公民参与程度的关系，发现阅报时间越长，公民参与程度的确越高。

关键词：苹果日报，公民参与，小报化

Abstract: The news has softened in Taiwan as well as in many countries. Many scholars start to worry about the impact of “tabloidization” on the readers’ behaviors of public performance, especially when Apple Daily came to Taiwan and became popular and influential. So, this study is aimed to explore the tabloid readers’ news preference (hard/soft new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s preference, civil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Using data from a random web

^①吕嘉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survey, the results show that people's reading preference on soft news is not related to both civil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While people show preference on hard news has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civil engagement. That is to say, people much more prefer reading hard news, they have higher civil engagement. But the preference on the hard news is not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we can't suppose people are only interested in entertainment-related information when they show higher preference on soft news. Besides, there's a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time spent on reading news and civil engagement.

Keywords : Apple Daily, civil engagement, tabloid, soft/hard news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一）研究缘起

香港《苹果日报》2003 年进驻台湾，彩色大标题的排版方式、软性新闻为主的取材角度、图像导向的呈现手法颠覆台湾传统报业（如自由时报、联合报）的习惯，犀利、敢言、辛辣的新闻内容，在台掀起一阵“狗仔风”，使本地的媒体也开始“水果化”（彭芸，2008）。据研究指出，国内报纸（如自由时报、联合报等）的政治新闻内文篇幅没有显著的减少迹象，但版面搭配照片的比例逐渐提高，整体来说，视觉导向的小报化新闻特色日益明显（尹俊杰，2008）。苏钥机（1997）指出，《苹果日报》是“完全市场导向新闻学”，以消费者的考虑出发，为求销量而置新闻专业规范于次要，此导向确立了《苹果日报》及其相关媒体产物的商业考虑，也保证他们对阅听众的绝对重视。

《苹果日报》这类小报化新闻饱受争议之处便在于其八卦娱乐成分，“八卦新闻”在新闻领域中泛指报导名人私生活、性丑闻、迷信、犯罪等题材（王泰俐，2004），沿用至今，“八卦”与“小报”二词几乎画上等号。部分民众对《苹果日报》、《壹周刊》这类小报化新闻持负面观感，忧心将成为暴力、色情的源头，甚至认为小报化对媒体是一种渐进的污染过程（苏蘅，2001）、威胁民主（Ornebring & Jonsson，2004）。但 Ornebring & Jonsson（2004）提出小报化新闻学作为“另类公共领域”的可能，得以发展出相对于主流来说较另类的议题、阅听人样态及新闻形式；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小报化新闻能提供较高的新闻内容多样性（Lee，2007），其新闻网站具备发展审议式民主的潜力。

另一方面，小报新闻的读者被质疑容易产生犬儒主义，缺乏公共参与的兴趣与政治知识，对政治的关心面向多为政治丑闻（Ornebring & Jonsson，2004），同时据 Richardson & Stanyer（2011）的研究，小报新闻读者纵使拥有响应新闻事件的空间及机会，表达自我意见的程度仍不及大报（broadsheet）读者，具对社会参与冷漠的倾向。因此本研究由上述讨论出发，有鉴于《苹果日报》在台的“小报化”代表性，专以《苹果日报》的读者为研究对象，探知小报读者偏爱的阅报内容为软性或硬性新闻，希望藉此厘清台湾《苹果日报》读者的阅报倾向，及此倾向是否会影响到其社会参与程度与政治知识，进一步将偏爱《苹果日报》软性新闻的读者与偏爱硬性新闻的读者做一比较。

（二）研究目的

《苹果日报》堪为小报化之代表，讲求内容的丰富度，具“副刊生活化”、“新闻娱乐化”、“报纸杂志化”等诉求，多用绘图、图片提升报导的可看性，连纸张的材质都有所讲究（苏钥机，1997），使市场导向新闻学脉络中的小报文化更加热烈，本研究的文献爬梳便以《苹果日报》的相关研究出发。但小报新闻的娱乐性，也引来批评指易造成阅听人对政治冷感、公民参与度偏低；同时据研究，《苹果日报》的读者人格特质偏外向型，使用动机则以“偷窥”、“人际关系”程度最高（刘艾蕾，2007），因此本研究便想针对《苹果日报》的读者，进行阅报内容与公民参与程度的关联性初探。

本研究采用调查法，于网络上发放问卷，不限受测者的年龄或社会经济地位，筛选出平时以《苹果日报》为主要阅读报纸的读者，进一步使之自评偏爱何种新闻内容（软性 / 硬性新闻），接着以改编过的“公民参与行为量表”（罗莹珊，2009）分别测量其公民参与程度。希望藉此研究达到以下研究目的：

- 1、厘清读者之阅报内容与公民参与、政治知识程度之关联。
- 2、了解偏爱软性新闻的读者，其公民参与程度及政治知识高低。
- 3、了解偏好软性新闻的读者，是否会只看软性新闻而习惯性略过其他版面。

4、偏爱《苹果日报》软性新闻的读者与偏爱硬性新闻的读者间，是否存有明显差异。

二、文献探讨

（一）小报化（tabloidization）

资本主义侵入生活，法国学者列斐伏尔认为当代社会已转型为消费社会，物体的存在形式转变成符号，过多的符号流窜，人类的生活全面受到符号宰制（Ben Highmore, 2009）。媒体身为产制符号真实的场所，在消费社会下，产业竞争更加激烈，新闻呈现方式日益花俏，并有市场导向新闻学、小报化新闻的诞生和蓬勃发展。

在香港方言中，小报一词便指“鸡零狗碎、闲言闲语、供人窥探的短文式消息”，有别于大报谈国家、军事、经济等严谨的内容，小报是煽情、追踪名人、人情趣味、丑闻等为主的报纸（彭芸，2007）。“小报”一词指涉的不仅是报纸形式上的短小，也指一种特定的选择与表现新闻的方式（Ornebring & Jonsson, 2004）。而小报化的概念出现于 19 世纪末的黄色新闻时期（苏蘅，2001），至 1991 年，小报化（tabloidization）这个词汇才正式出现（彭芸，2008）。

有学者提及软性新闻是市场导向新闻的概念（MacManus, 1994），目前的讨论也常将小报化与软性新闻画上等号（Baum, 2003），并将小报化视为报业的堕落，是不好的新闻。Franklin（1997）指出小报化的发生不再局限于原始形式一报纸，各类媒体都越来越朝小报新闻学发展，即报导内容越来越软性（转引自 Ornebring & Jonsson, 2004）。普遍来说，软性新闻泛指艺文、休闲、运动等相对于传统公共事务的新闻，Baum（2003）便定义软性新闻是较为耸动、以名人中心、偶发的新闻事件，和小报新闻强调以煽色腥、名人文化、耸动、揭人隐私等言论取向类似，其中小报新闻的“八卦”特色显著，同时配合图像、大幅而惊悚的标题达到戏剧性效果，与软性新闻同为一种信息娱乐化的概念，也是 Habermas 所说的新闻与娱乐的界限模糊（1989；转引自彭芸，2008）。小报、软性新闻辛辣赤裸的报导虽惹来骂声不断、具侵犯隐私之嫌，却也有不少民众趋之若鹜，也有人不讳言自己是“爱看又爱骂”。

而小报化新闻的出现被归因为媒体产业的过度竞争，在台湾又以电视新闻的小报化最为严重，特征包括画面有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标题、图案标志、跑马灯及配乐（牛隆光，2005）。可以归纳出，小报新闻的特色在其夸张的表现形式，及具搜奇性、八卦性、煽情化、琐碎化及偷窥化等特性的八卦新闻内容（王泰俐，2009）。

一般大众对小报化的观感偏向负面，认为小报内容诉诸于感官与丑闻，简化、私人化了新闻事件，会降低公共论述的水平，甚至会对民主政治造成威胁，并使民众的公民参与兴趣降低、对政治冷感，造成犬儒主义（Ornebring & Jonsson, 2004），也有学者直指小报化对新闻媒体来说是一种渐进式的污染过程（苏蘅，2001）。另一方面，Ornebring & Jonsson（2004）提出小报化新闻学作为“另类公共领域”的可能，认为小报能报导先前被主流媒体忽略的事件，进而吸引新一批公众，发展出相对于主流来说另类的议题、阅听人及新闻形式，产生新的批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小报化新闻具备容纳更多元观点、议题，甚至是异质的阅听人（消费者）的价值，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新式的小报化新闻，能提供较高的新闻内容多样性（Lee, 2007），Baum（2003）也提出软性新闻更能促进民主的说法。

国内曾有学者对台湾报纸读者进行媒体偏好内容与政治态度之关连性研究（彭芸，2007），却未有针对小报新闻读者做阅报内容偏向与公民参与行为两变项间的关系讨论，笔者认为香港《苹果日报》的登台，对台湾报业造成不小冲击与改变，在台湾媒体产业具有指针性意义，可谓台湾小报新闻之代表，故选择《苹果日报》的读者为研究对象，将阅报内容倾向区分为软性、硬性新闻，以此分类探知读者的公民参与程度，以及其阅报行为是否具有显著关联及

差异。

（二）公民参与、政治知识

首先，对“公民”及“公民参与”进行名词定义。从广义上来看，“公民”指主体在社会生活、公共领域中拥有做人民的权利与义务；狭义的公民则是指主体拥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刘湘川，1997；转引自孙建文，2007）。而从狭义来看“公民参与”，指的便是投票选举行为；广义来说，即公民对公共决策、公共事务的涉入，也就是参与式民主，透过中介性的社会组织或社会运动，进行社会自治（孙建文，2007）。大致而言，公民参与是一种由下而上的参与形式（袁鹤龄，2007），是对社会关怀的态度，亦是对公共利益的争取与实践，可比为草根性力量，有助于化解民众对公领域的陌生或对公共政策的怀疑。承上，可以归纳出公民参与立基于民众对公共事务的情感与主动性行为表现，而本文在探知研究对象的公民参与程度时，兼采狭义与广义之指标，以投票行为、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运动等项目测量。

在孙建文（2007）对公民参与定义的十项知识与能力中，便有“参与民主政治的能力”、“理性沟通及有效表达意见的能力”等与政治领域切合之处，只不过公民参与涉及的层面比“参政”广泛得多。彭芸（2007）于研究中也指出，民众的政治知识会影响其民主政治的参与和评价，因此本研究在探知公民参与程度时，加入测量研究对象的政治知识，即对政治事实、信息的了解，试图探讨小报新闻读者喜爱的媒体内容，是否会影响其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及行为表现。

而在媒体与公民参与的关系中，多数研究认同媒体（平面媒体、广电媒体等）对公共事务的报导与评估，是民众在短时间内获得信息的来源之一，能影响他们公共事务态度与价值观。Chaffee（1977）的研究也指出，一个人的公民参与程度，和其使用大众媒介的类别有关，较常使用平面媒体的读者，其使用行为与公民参与程度的相关性高于使用广电媒体者（转引自罗莹珊，2009）。至于媒体对政治消息的传达具影响力，陈义彦（1977）的研究中发现，越常阅读报纸中国际版、政治经济新闻及社论者，其阅报行为与政治兴趣、社会参与、民主信念间具有显著正相关（转引自罗莹珊，2009）。也就是说，媒体对民众的政治知识、公民参与行为具有传递、加强、促成等功能，其中又以平面媒体的影响力大于广电媒体，得以在无形中塑造民众对政治的基本概念与行为取向。

虽有不少论述肯定平面媒体促进民众涉入公共事务的影响力，但对小报新闻的研究多认为此类八卦小报会伤害民主，降低公共论述的标准，甚至容易使读者产生犬儒主义、对社会与政治冷感，就算会从报纸、电视或网路取得国家或政治现况，也是着重于「政治丑闻」的部分（Ornebring & Jonsson，2004）。此外 Dahl（1998）也曾指出，人们得到的信息越多，未必就能促进公民能力（转引自彭芸，2007），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媒体能提升民众对公共议题的关心程度，公民的政治知识直接受到教育与媒体的影响（彭芸，2007），尤其这类小报以趣味的手法报导硬性题材，更能唤起原先较为冷漠的阅听人对公共事务的注意。

根据研究，《苹果日报》读者的阅报动机以“人际关系”、“偷窥嘲讽”两者的程度最高（刘艾蕾，2007），从这个出发点进行的阅报行为，是否会使这群读者对公共事务更显冷漠，或因此忽略硬性新闻内容，同时阅听人偏好的媒体内容，会对其看待社会造成甚么影响，便是本研究想要探讨之处。此外，基于学界对媒体使用行为、小报读者阅报行为与公民参与程度间的争论，本研究欲验证阅报行为与公民参与、政治知识间的关联，探知小报的读者是否也如一般使用平面媒体的阅听人：较常阅读硬性新闻，政治兴趣、社会参与程度较高（陈义彦，1977；转引自罗莹珊，2009）；相对地，较常阅读软性新闻，其公民参与程度便越低。

（三）研究问题与假设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本研究试探究小报读者的阅报行为及其公民参与程度之关联，其中公民参与涉及民主政治的能力，故增加测量政治知识一项，主要的研究问题如下：（一）读者平时花多少时间看《苹果日报》？（二）他们阅报时以哪些版面为主？（以软性与硬性新闻区分）（三）他们是否了解几项当今重要政治事实？（四）他们的社会参与行为表现和政治知识如何？（五）偏好软性新闻的读者，是否就只关心娱乐、轻松的题材，而对其他版面没有兴趣？（六）偏好软性新闻与硬性新闻的两批读者，在公民参与程度及政治知识上有无差异？结合以上讨论及疑问，提出下列假设与研究问题：

- H1.1 阅报内容倾向越偏“软性新闻”的读者，公民参与程度越低。
- H1.2 阅报内容倾向越偏“软性新闻”的读者，政治知识越低。
-
- H2.1 阅报内容偏向越偏“硬性新闻”的读者，其公民参与程度越高。
- H2.2 阅报内容偏向越偏“硬性新闻”的读者，其政治知识越高。
-
- H3.1 阅报内容倾向偏硬性与偏软性者，其公民参与行为程度有差异。
- H3.2 阅报内容倾向偏硬性与偏软性者，其政治知识的高低有差异。
- RQ1 阅报内容倾向越偏“软性新闻”的读者，是否会对娱乐名人以外的版面较无兴趣？

三、研究方法

随着当代传播科技的去镶嵌化、去脉络化，媒介环境亦产生根本性地改变，新闻与娱乐的界线模糊，市场导向新闻学全面侵袭媒体，阅听人喜爱的媒体内容逐渐从硬性内容转往软性新闻（彭芸，2007），新闻的小报化现象备受重视。在台湾，《苹果日报》的小报新闻特色鲜明独特，可说是台湾小报风之先锋，而小报新闻对阅听人公民参与程度、政治态度的影响，一直备受讨论，存在正反两方的声音，反对者认为小报新闻会导致公民素养降低，也是对新闻媒体的一种污染；支持者则期待小报成为另类公共领域。立基于此，本研究便要探讨《苹果日报》读者的阅报行为与其公民参与程度、政治知识高低之关联性，比较偏爱软性新闻的读者与倾向硬性新闻的读者，在这两者的行为表现上是否有明显不同。

本研究采用调查法，于网络社群平台发放问卷（附录一），由于本研究并未探讨读者人口特质分布与公民参与程度的关联，故不限受试者的年龄及社经地位等，凡看过《苹果日报》者皆为研究对象，分别以个人阅报行为、公民参与行为、政治知识三部分测量，以下为问卷各部分之操作化定义解释：

首先，在个人阅报行为部分，先以单选题的方式询问受测者每天花多少时间看《苹果日

报》，做为其小报化程度的参考标准；接着以李克特式量表测量读者阅读各版面的频率及对《苹果日报》的看法，请受测者针对各版面进行频率自评，用以区分受试者的阅报内容偏向为硬性新闻或软性新闻。在版面的选择上，本研究以《苹果日报》的版面分配为依准，设定头条要闻、国际新闻、中国新闻、专栏论坛、财经版为硬性新闻；体育版、消费版、副刊生活、科技版、娱乐名人为软性新闻。频率题项“从不”、“很少”、“偶尔”、“经常”、“每次都看”，在硬性新闻当中，最低“从不”计为 1 分、最高“每次都看”5 分，依序类推；软性新闻则反向计分，“从不”得-1 分，「每次都看」计-5 分，计算受测者获得的总分，总分若为正数，即属于偏向硬性新闻，若为负数，便是偏向软性新闻，作为阅报内容的偏向分类。分数高低进一步代表偏向程度，在此将软性新闻读者获得的总分乘以-1，获得一正数，便代表其偏爱软性新闻的程度。

不在问卷中事先告知版面设定的原因，在于避免受测者认知软性新闻是不好的新闻，而不想承认自己的阅报倾向。同理，为求客观，本部份第三题询问受测者对于“一般读者”受《苹果日报》影响的想法，从“不会”、“可能不会”、“不确定”、“可能会”到“会”，推论大众对政治、社会的态度受《苹果日报》影响的程度，验证偏向软性新闻者，是否会对娱乐名人之外的版面较无兴趣。

第二部分为公民参与行为自评量表，改编自罗莹珊（2009）的“公民参与行为量表”，共 11 道题目，皆为对公共事务、政治参与的具体行为描述，以“从不”、“不常”、“偶尔”、“常常”、“一定”为题项，11 道题目总分的高低即受试者的公民参与程度高低。而有鉴于学者指出，民众的政治知识会影响对民主政治的评价及对公共事务的涉入度（彭芸，2007），故本研究在第三部分加入五题政治事实的选答（如附录一），凡答对者以得 1 分计，答错或答“不清楚”皆不予计分，总分代表受试者对政治信息的了解度。最后分别比较偏向软性与硬性新闻的读者，在“公民参与行为量表”、“政治知识”两个部分的表现是否存有差异。

问卷最后为基本资料，本研究并未加入人口变项为自变项，故本部份的统计结果仅供参考。希望藉此厘清台湾小报新闻读者的阅报倾向，及这个偏向对其公共参与、政治知识高低的影响，进而比较偏好阅读软性新闻的读者和偏好硬性新闻者，在公民参与程度上之关联。

四、资料分析

（一）受测者基本数据

本研究于网络社群平台 Face book 与批踢踢实业工坊发放问卷（附录一），共收回 124 份，皆为有效样本。由表一可知，受测者中以女性较多（60.5%）；21 到 30 岁间的受测者占全体比例逾七成（75%），其次为 31 到 40 岁（16.9%）。

表一：受测者基本数据

受访者基本数据	次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49	39.5%
女	75	60.5%
总和	124	100.0%
年龄		
15-20岁	7	5.6%
21-30岁	93	75.0%
31-40岁	21	16.9%
41-50岁	1	0.8%
50岁以上	2	1.6%

总和	124	100.0%
政党倾向		
国民党	24	19.4%
民进党	21	16.9%
亲民党	1	0.8%
台湾团结联盟	1	0.8%
其他政党	2（皆为绿党）	1.6%
不支持任何政党	27	21.8%
选人不选党	48	38.7%
总和	124	100.0%

（二）阅报内容偏向与公民参与行为、政治知识之关联

研究一开始先对公民参与行为量表进行信度分析，测得Cronbach'α系数为0.839。据吴明隆（2008）对可信度高低的画分，本研究采用的公民参与行为量表具备足够信度。

接着统计124位受测者阅读《苹果日报》十个版面的频率，进而对其阅报倾向进行分类，并以其总分高低代表偏向程度。共45位读者较常阅读硬性新闻（头条要闻、国际新闻、中国新闻、专栏论坛、财经版），68位较常阅读软性新闻（体育版、消费版、副刊生活、科技版、娱乐名人），11位中性读者没有偏向，不符本研究需要，不列入后续计算，针对《苹果日报》读者的阅报行为与公民参与程度、政治知识的关联，最后以113位受测者为分析样本。

此外，统计硬性 / 软性两组受测者各自在公民参与行为量表、政治知识上的得分，与其硬性、软性新闻偏向程度做相关分析，发现软性新闻的偏向程度，与公民参与行为及政治知识并无相关（ $r=0.015$ ； $r=0.043$ ），常看软性新闻与否，跟读者是否常投入公共事务、了解政治事实没有关连，也不能直接证明前述学者所说：软性新闻的趣味手法可能唤起原本较无兴趣的阅听人投入公共事务（彭芸，2007）；而硬性新闻读者的偏向，则与公民参与行为呈中度正相关（ $r=0.511^{**}$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硬性新闻的读者常暴露于政治、社会、国际等题材下，能直接被促使参加或思考公共事务，公民参与的行为表现机率较大，但与政治知识的表现没有关连。因此可推得假设1.1与假设1.2不成立；假设2.1成立，假设2.2则不成立。

表二：阅报内容偏向程度与公民参与行为、政治知识的相关分析

	公民参与行为	政治知识
软性新闻偏向程度	$r=0.015$ $p=0.905$	$r=0.043$ $p=0.730$
硬性新闻偏向程度	$r=0.511^{**}$ $p=0.000$	$r=-.003$ $p=0.983$

注：**. 在显著水平为0.01时（双尾），相关显著。

（三）阅报内容偏向在公民参与程度与政治知识高低之差异

看完阅报内容偏向与公民参与行为、政治知识的相关后，进一步分析偏硬性与偏软性读者在公民参与行为的表现及政治知识高低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首先是「公民参与行为」部分，如表三，得知阅报内容偏硬性与偏软性两者，在公民参与行为的表现上具有显著差异（ $t=2.299$ ， $p<0.05$ ），假设3.1成立。但两组变异数的政治知识高低却未存差异（ $t=1.771$ ， $p=0.079$ ），假设3.2不成立，这个现象应导因于问卷中「政治知识」题目设计不良，又以网络发放问卷，无法避免受测者询问他人或查询答案的可能性，故不管阅报内容偏向软性或硬性，读者的政治知识高低并没有明显不同，阅报内容的偏向无法预测政治知识高低。

表三：阅报内容偏向与公民参与行为、政治知识的独立样本检定

		变异数相等的 Levene 检定		平均数相等的t检定		
		F 检定	显著性	T	df	显著性（双尾）
公民参与	假设变异数相等，	9.274	.003	2.482	111	.015
	不假设变异数相等			2.299	70.808	.024
政治知识	假设变异数相等，	.006	.941	1.771	111	.079
	不假设变异数相等			1.788	100.002	.077

注：根据变异数相等Levene检定发现F值为9.274，显著性为0.003，小于0.05显著水平，代表软性 / 硬性两组变异数有明显不同。

有鉴于台湾的狗仔文化兴盛，《苹果日报》的“娱乐名人”版具有高度小报化特性，是许多读者常看的版面之一，本研究中便有66.3%受测者表示“经常”与“每次都看”，但 Ornebring & Jonsson（2004）提出这类八卦内容会降低公共论述的标准，或使读者对其他硬性内容冷感，因此本研究提出一研究问题，试图了解越喜欢看软性新闻的读者，是否只关注娱乐题材，而对其他版面较无兴趣。

经分析发现，软性新闻偏向程度与“有人认为，阅读《苹果日报》会让读者对娱乐名人以外的版面没有兴趣，请问您的看法？”此一问题间无相关性存在（ $p=0.961$ ），这个部份可以从软性读者的阅报版面次数统计中验证，虽然有高达83.8%的读者阅读娱乐名人版的频率为“经常（33.8%）”、“每次都看（50%）”，但同时也达72.1%的偏软性新闻读者表示“经常”、“每次都看”头条要闻；80.9%“偶尔”、“经常”、“每次都看”国际新闻。可由上述推知，越爱看软性新闻的读者，不见得认为其他人会略过娱乐名人外的版面，自己也不尽然会对娱乐以外的新闻内容冷漠。

（四）阅报时间长短与公民参与程度

本研究额外针对读者每日阅报的时间长短与公民参与程度、政治知识进行相关分析，从表四中可以看到，平均每天看《苹果日报》的时间和公民参与行为程度具显著正相关（ $p < 0.001$ ），每天看报的时间越长，其公民参与程度越高，可以推论，阅报时间越长，曝光于公共事务、公民议题的机率增加，从事公民参与、政治行为的诱因较多，故有这样的分析结果。

表四：每日阅报时间长短与公民参与行为、政治知识的相关分析

		1、请问您平均每天会花多少时间看《苹果日报》？公民参与 政治知识		
1、请问您平均每天5花多少时间看《苹果日报》？	Pearson 相关	1	.320**	.167
	显著性（双尾）		.000	.063
	个数	124	124	124
公民参与	Pearson 相关	.320**	1	.203*
	显著性（双尾）	.000		.023
	个数	124	124	124

政治知识	Pearson 相关	.167	.203*	1
	显著性 (双尾)	.063	.023	
	个数	124	124	124

注：**. 在显著水平为0.01时 (双尾), 相关显著。*. 在显著水平为0.05 时 (双尾),

相关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针对小报新闻读者的阅报行为与公民参与程度进行关联性研究,有鉴于以往的研究太广泛地总揽各报读者为研究对象,反而忽略小报读者的特殊性,因此本研究缩小范围,厘清台湾小报新闻读者的阅报倾向,以《苹果日报》的读者为例,探究其阅报内容偏向(软性/硬性)对其涉入公共事务、政治知识高低的影响,进而比较偏好阅读软性新闻的读者和偏好硬性新闻者,在公民参与程度、政治知识表现上之关联与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平时阅报内容偏向软性新闻的读者,其公民参与程度不一定越低,亦不一定较缺乏政治知识;阅读软性新闻的偏向程度,跟读者是否常投入公共事务、了解政治事实不相关。反观偏向硬性新闻的读者,偏向程度越高,公民参与程度越高,呼应陈义彦(1997)发现的较常阅读硬性新闻,政治兴趣、社会参与程度较高(转引自罗莹珊,2009),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硬性新闻的读者常暴露于政治、社会、国际等题材下,能直接被促使参加公共事务或激发对公民议题的思考,进而较有公民参与的行为表现,而政治知识的部分与硬性新闻偏向程度仍无相关性,读者对硬性新闻的偏向程度可能来自国际新闻、财经、专栏论坛等版面,而不专于政治、地方社会或头条要闻,故不能说越常看硬性新闻,便能较清楚政治信息。

研究也发现,在偏软性与偏硬性新闻的两批读者间,公民参与程度的确存有显著差异,在政治知识的高低上则无,此现象或许导因于问卷中“政治知识”题目较少,又以网络发放问卷,无法完全避免受测者询问他人或查询答案的可能,故不管阅报内容偏向软性或硬性,读者的政治知识高低并没有甚么不同,此结果可跟上段“政治知识与阅报内容偏向程度无相关性”相互佐证,阅报内容的偏向无法预测政治知识高低。

而阅报内容倾向软性新闻的读者,不一定就只关注娱乐名人,而习惯性忽略其他版面或硬性新闻内容,两者间不相关,阅报内容虽然偏向软性新闻,仍无法假设其对娱乐名人之外的版面没有兴趣。这部分可能因为《苹果日报》内容较为花俏丰富,高度娱乐化、软性化,淡化硬性新闻的严肃感,反而可能吸引原本对硬性题材较冷感的读者群,故软性新闻偏向的读者在看娱乐、轻松内容的同时,仍具备转而注意其他版面的可能。

最后研究加测阅报时间长短与公民参与程度的关系,发现阅报时间越长,的确会使公民参与程度越高。以此推论,阅报时间越长,越有机会看更多版面,增加曝光于公共事务、公民议题的机率,因而增强公民参与、政治行为程度。但阅报时间长短却与政治知识高低无关,原因可能出自本研究的政治知识测量为时事问答,若近期内无接触相关新闻,便会得到较低分数。同时,阅报时间长短并不能揭露读者对阅读版面的时间分配,无法证明阅读时间越长,越了解政治信息,故有以上的研究结果。

五、研究限制

本研究专以《苹果日报》的读者为研究对象,具受测门坎,研究结果亦受局限,未来可加入测量读者阅读其他报(如《联合报》、《自由时报》)的时间分配,观察其阅报行为及公

民参与程度，进而与《苹果日报》的读者做更巨观的比较。此外，应加入“阅报时间”为中介变项，探知在时间匆促或足够的情形下，读者的阅报行为偏向是否会有所改变，又在时间的影响下，其政治知识的高低与公民参与的意愿是否会因此变动。最后，本研究在挑选政治知识的题目时，并无透过任何量表或筛选门坎，且题目数量不足，测量结果恐不够有代表性，未来应对政治知识进行题项分析，并加入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政治相关项目测量，对读者的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做更完整的关联性研究。

附录一：

问卷编码表

先生 / 小姐您好：本问卷旨在研究台湾读者的阅报行为与公民参与程度之关联，以下有四部分的问题，分别是个人阅报行为、公民参与行为量表与政治知识，最后则是基本数据，可能会耽误您一些时间，请依个人经验与直觉回答，问卷结果仅作为学术研究用途，并采匿名方式，敬请安心填答，在此感谢您的协助。

研究者：政大新闻所硕士班研究生吕嘉熏

有任何问题或宝贵意见，欢迎来信：lch715@gmail.com

一、个人阅报行为

1、请问您平均**每天**会花多少时间看《苹果日报》？

- (1) 15 分钟以下
- (2) 16 分钟到 30 分钟
- (3) 31 分钟到 60 分钟
- (4) 61 分钟到 90 分钟
- (5) 91 分钟到 120 分钟
- (6) 120 分钟以上

2、请问您看下列报纸版面的频率为何？（版面名称以《苹果日报》为准）

2.1 头条要闻

- (1)从不 (2)很少 (3)偶尔 (4)经常 (5)每次都看

2.2 国际新闻

- (1)从不 (2)很少 (3)偶尔 (4)经常 (5)每次都看

2.3 中国新闻

- (1)从不 (2)很少 (3)偶尔 (4)经常 (5)每次都看

2.4 体育版

- (1)从不 (2)很少 (3)偶尔 (4)经常 (5)每次都看

2.5 消费版

- (1)从不 (2)很少 (3)偶尔 (4)经常 (5)每次都看

2.6 专栏论坛

- (1)从不 (2)很少 (3)偶尔 (4)经常 (5)每次都看

2.7 财经版

- (1)从不 (2)很少 (3)偶尔 (4)经常 (5)每次都看

2.8 副刊生活

(1)从不 (2)很少 (3)偶尔 (4)经常 (5)每次都看

2.9 科技版

(1)从不 (2)很少 (3)偶尔 (4)经常 (5)每次都看

2.10 娱乐名人版

(1)从不 (2)很少 (3)偶尔 (4)经常 (5)每次都看

3、有人认为，阅读《苹果日报》会对读者产生下列影响，请问您的看法？

3.1 对政治人物不信任

(1)不会 (2)可能不会 (3)不确定 (4)可能会 (5)会

3.2 对政治充满无力感

(1)不会 (2)可能不会 (3)不确定 (4)可能会 (5)会

3.3 对社会环境感到失望

(1)不会 (2)可能不会 (3)不确定 (4)可能会 (5)会

3.4 对娱乐以外的版面没有兴趣

(1)不会 (2)可能不会 (3)不确定 (4)可能会 (5)会

二、公民参与行为量表

4.选举期间，我会阅读候选人的传单、快报或相关报导。

(1)从不 (2)不常 (3)偶尔 (4)常常 (5)一定

5. 我会主动关心候选人的政见。

(1)从不 (2)不常 (3)偶尔 (4)常常 (5)一定

6. 我会进行投票。

(1)从不 (2)不常 (3)偶尔 (4)常常 (5)一定

7. 我会参加游行或示威活动争取公众利益。

(1)从不 (2)不常 (3)偶尔 (4)常常 (5)一定

8. 我会上网对公民议题、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不拘平台）。

(1)从不 (2)不常 (3)偶尔 (4)常常 (5)一定

9. 我会参加公共事务或政策性活动的联署。

(1)从不 (2)不常 (3)偶尔 (4)常常 (5)一定

10. 我会主动从报纸、电视或网路等媒体获知国家社会的发展现况。

(1)从不 (2)不常 (3)偶尔 (4)常常 (5)一定

11. 我会阅读有关公共事务的宣传品或政策性资料，以了解公共事务的信息。

(1)从不 (2)不常 (3)偶尔 (4)常常 (5)一定

12. 我会主动与他人讨论公共事务或公民议题。

(1)从不 (2)不常 (3)偶尔 (4)常常 (5)一定

13. 我参加各种志愿性的社会服务活动，如环保志工、医院志工等。

(1)从不 (2)不常 (3)偶尔 (4)常常 (5)一定

14. 我会捐献金钱或出力协助社会上各类爱心活动，如捐血、义卖等。

(1)从不 (2)不常 (3)偶尔 (4)常常 (5)一定

三、政治知识

以下五题为政治事实问答，请您凭记忆填写。

15. 请问现任中国国家主席是？

(01)胡锦涛 (02)吴邦国 (03)温家宝 (97)不清楚

16. 请问台湾现任财政部长是？

(01)刘忆如 (02)张盛和 (03)赖浩敏 (97)不清楚

17. 请问台湾现任监察院长是谁？

(01)谢长廷 (02)王建煊 (03)陈唐山 (97)不清楚

18. 请问现任民进党党主席是？

(01)蔡英文 (02)苏嘉全 (03)苏贞昌 (97)不清楚

19. 请问香港现任行政长官(即行政首长)是谁？

(01)董建华 (02)朱镕基 (03)梁振英 (97)不清楚

四、基本数据

20. 性别

(01)男 (02)女

21. 工作状况

(01)工作者

(02)笔者

(03)家庭主妇 / 夫

(04)无工作者

(05)其他(请说明_____)

22. 教育程度

- (01) 小学或以下
- (02) 国中
- (03) 高中 / 职
- (04) 大学 / 专
- (05) 硕士以上

23. 年龄

- (01) 15-20 岁
- (02) 21-30
- (03) 31-40
- (04) 41-50
- (05) 50 岁以上

24. 请问在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台联党中，您比较支持哪一个政党？

- (01) 国民党
- (02) 民进党
- (03) 亲民党
- (04) 台湾团结联盟(台联)
- (05) 其他政党(请说明)
- (07) 不支持任何政党
- (08) 选人不选党

参考文献：

- 王泰俐：《八卦电视新闻的阅听众接收分析》，载《传播与管理研究》，2009（8），3~36 页。
- 牛隆光：《电视新闻“小报化”及其守门过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 尹俊杰：《报纸政治新闻小报化倾向初探—〈苹果日报〉在台发行前后之比较》，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 何旭初：《市场导向新闻学之思维与运作：〈苹果日报〉个案分析》，载《中华传播学刊》，2007（11），243~274 页。
- 吴明隆：《SPSS 操作与应用—问卷统计分析实务》，台湾，五南，2008。
- 周群英译（2009）。《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台北：韦伯文化。（原书 Ben Highmore [2002].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 an introduction*. London , NY : Routledge.）
- 袁鹤龄：《全球化趋势中的公民参与》，载《行政院研考会研考双月刊》，2007（31），74~85 页。
- 孙建文：《大笔者公民参与态度与行为之研究》，高雄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 彭芸：《21 世纪新闻学与新闻学研究》，台北，双叶，2008。
- 彭芸：《我国民众媒体内容偏好与其政治态度之关连性研究》，载《选举研究》，2007（14），85~117 页。
- 罗莹珊：《北台湾大笔者新闻素养和公民参与之相关研究》，屏东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 刘艾蕾：《〈苹果日报〉读者阅报动机与人格特质之研究——以台北市为例》，世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 苏蘅：《小报化的趋势分析》，载《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NSC 89-2412-H-004-031》，2001。
- 苏蘅：《台湾和香港报纸转型：市场如何转变新闻的意涵》，载《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NSC 94-2412-H-004-014》，2006。
- 苏钥机：《完全市场导向新闻学：〈苹果日报〉个案研究》，载《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陈韬文、朱立、潘忠党编，215~233 页，香港，炉峰学会，2007。
- Baum, M. (2003). Soft News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Evidence of Absence or Absence of Evidenc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 2, 173-190.

- Deuze, M. (2005). Popular journalism and professional ideology: tabloid reporters and editors speak out.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7, 6, 861-882.
- Graber, D. (2003). The Rocky Road to New Paradigms: Modernizing News and Citizenship Standar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 2, 145-148.
- Johansson, S. (2007). *Reading tabloids: Tabloid newspapers and their readers*. Huddinge: Södertörns högskola.
- Lee, Ya-ching (2007). Effects of market competition on Taiwan newspaper diversity.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20, 2, 139-156.
- Machin, D., & Papatheoderou, F. (2002). Commercialization and Tabloid Television in Southern Europe: Disintegration or Democratiz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Journal of European Area Studies*, 10, 1, 31-48.
- MacManus, J.H. (1994). *Market-driven journalism: let the citizen bewar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Ornebring, H., & Jonsson, A. M. (2004). Tabloid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abloid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5, 3, 283-295.
- Richardson, J. E., & Stanyer, J. (2011). Reader opinion in the digital age: Tabloid and broadsheet newspaper websites and the exercise of political voice. *Journalism*, 12, 8, 983-1003.

当代新闻传播与文化变迁研究

乡村文化变迁：阶段，维度与意义 ——以华县皮影为例探索民艺传承的内在困境

The Village Cultural Change: Stage, Dimensions and Significance: Taking Huaxian Shadow Pla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Inherent Dilemma of Rural Heritage

沙垚^①

中文摘要：本文关注“非遗繁荣的困境”，即一方面大繁荣大发展，一方面开发一处、破坏一处。同时本文亦使用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以华县皮影为例，回归历史，分三个阶段，从社会、政治和市场三个维度，讨论乡村文化意义的建构、传播和变迁。

关键词：非遗，困境，符号，意义，乡村文化变迁

Abstract: Nowaday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falling into the plight of prosperity. Specifically, this decade is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in the era of great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destroyed as well as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I take Huaxian shadow pla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communication and changes of significance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I return back to the history context and discuss these in three dimensions (social, political and market) under critical theory of ideology.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plight of prosperity, symbol, significance, cultural change.

^①沙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陷入“怪圈”。一方面，在国家强力动员和学者、文化人士的热情召唤之下，社会意识到“非遗”产业大有可为，媒体开始《呼唤“非遗”大发展大繁荣的春天》，文章认为“最好的传承是将其融入社会、步入市场、走进公众的生活”，“特别是和发展旅游业紧密结合，在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传承和可持续发展，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①

同时，反思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一处，破坏一处”的声音也从未停止过。杜绝“建设性破坏”、“保护性拆除”、“掠夺性开发”、“绝对商品化”等建议甚至成为两会热点提案，专家们建议“设立黄牌警告与红牌除名机制”，“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等。

文化，尤其是“遗产”，是否应当成为流通的“大繁荣”的商品？制度是否拥有“魔蛋式”的力量，即一旦建立，就能引起被规范者的直接反应，并左右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但无论是陶醉于“非遗”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还是迷恋于制度的力量，都会忽视一个根本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要传承什么？反观近年的“乡村归来”的浪潮，我们发现“问题在向深处蔓延”。本文是在这个层面上讨论乡村戏班的传承。以华县皮影为例，回到具体语境中，从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维度探索 20 世纪以来皮影戏的传播实践，及其意义的建构与变迁。这样才能理解乡村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困境。

一、1949 年之前：意义在社会——人生-村落整合秩序

影戏在传统社会的传播，不仅仅表现为演出的盛况，提供娱乐和教化，甚至也不仅仅是某个时期的繁荣。西美尔认为“某些种类的传播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成为稳定的或固定的，因此代表着文化和社会结构。”^②影戏在传统社会固定下来，并成为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东西，才是詹姆斯·凯瑞所认为的“意义”，“传播是对意义的探寻而不是事实的再现”。^③作为民间艺术，它的意义是谁的意义？如何产生，如何传播，又如何嵌入到乡村结构之中？

1949 年之前的传统社会，影戏传播的意义在于社会维度，即参与建构了乡村社会秩序：“人生-村落整合秩序”^④。传统乡村一个人出生、满月、周岁、成人、结婚、生子、过寿、死亡等，亲戚朋友都会送礼以表达祝贺。主人酬谢宾朋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宴客，二是请戏（在乡村主要是皮影戏）。关中人把这样的集会称为“过事”。在他们的意识中，庆典是个人、家庭、乃至村落重要的“事情”。平常日子，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饭、劳动、聊天、睡觉，每天的生活是重复性的。但“过事”，村里都会一下子热闹起来，可以很多人聚在一起。宴会，可以享受美食，分享故事，听听哪里有新鲜的事情发生；看戏，可以娱乐身心，消解生活的压力，同时提供想象的空间，去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

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⑤，在这个社会中，从父母到孩子，人生周期一直在循环。一方面，是这些一代又一代的人按照一定的“定位秩序”^⑥构成了村庄的历史和现实，他们人生的仪式按照时间排序，在村落空间中依次成为庆典。同时，每一次庆典，其他村民都会过来看戏，换言之，每一个村民都会参与到另一个村民的个人的人生仪式之中，分享他人的人生时空，并获得娱乐。

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个体与自我的观念是在人们卷入社会和文化的复杂网络时建构起来的。”^⑦村庄里每个人的人生节点，都成为村庄的庆典，所有村民的人生交织在一起构成一

^①钟兴旺：《呼唤“非遗”大发展大繁荣的春天》，载《大江周刊（焦点）》，2012（5），1 页。

^②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155 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③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63 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④沙垚：《从影戏到电视：乡村想象共同体的解构》，载《新闻大学》，2012（1）。

^⑤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26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⑥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422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⑦罗布特编：《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麦永雄等译，161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张庆典之网。影戏不仅见证了每一个庆典，参与了每一个庆典。反过来，影戏本身也成了庆典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正呼应了阿尔都塞的理解，表达体系（包括语言、神话、宗教等等）起着把个体建构成为社会主体的功用，促进个人身份意识的产生与认同。^①

简而言之，这一时期影戏的意义主体是村民和乡村，影戏作为桥梁和载体，将村庄和个人主体意识连接起来，互不可分，同时对于村庄的结构和秩序也起到建构和维系的作用。《罗氏家谱》中便严肃的写到“凡祭祀迟到、不到者，罚请灯影戏”。在此过程中，影戏的传播与传承获得意义。

二、1949-1966 年：意义在政治——碰撞出的主体性

（一）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影戏来说意味着什么？

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先后历经了土地改革、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变革后，乡村的组织结构、社会秩序、经济活动方式、农民的意识形态、文化消费方式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段时期是“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是“从自然村落到集体共同体社会”的过程。^②国家对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以及各种诸如谋生、发展和信息资源在内的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意识形态是总体性的，政治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经济与其他社会生活是高度政治化的。^③这一时期，作为文化表达方式的影戏及其意义也必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迁而发生转移，从社会维度偏向政治维度。

但是，作为“封建遗物”的皮影戏在变迁中非但没有没落，反而是“再造春天”，从历史档案来看，原因在于影戏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乡村的传播工具。1951 年 5 月 5 日，在总结各地戏曲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国家发布了新中国戏改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简称“五五指示”），其中明确了“再造”的原因和方向：“戏曲艺人在娱乐与教育人民的事业上负有重大责任”。

首先，剧本的挖掘与再造，“《楚宫》是过去不常演的，这次才挖掘出来的一个剧目。像这样一个刻画了帝王丑恶嘴脸的剧目..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民族戏剧艺术遗产是多么的丰富多彩，这是值得我们今后继续加以大力发掘和学习的。”^④从 1950 年由周恩来、周扬、田汉等牵头发起“改人、改戏、改制”到文化部（1961）文艺平字第 1371 号文件《关于加强戏曲、曲艺传统剧目、曲目的挖掘工作的通知》，传统剧目的整理和挖掘工作持续了十年，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旧瓶装新酒”，发现老戏的当下意义，如爱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等。

其次，艺人的再造。唱戏的从受人冷眼的“龟子”一跃成为受人尊敬的“文艺工作者”，通过政府“送温暖”，艺人配合“土改”等运动，推翻了压迫他们的“箱主”，体会到很强的翻身感。1956 年华县皮影会演期间，年过七十的老艺人宋申娃、焦根娃不辞劳苦来回跑了几十里路，搜寻了挤压多年的老剧珍本十四本，其中有长时间未上演的《四明珠》等。“民众有了参与的冲动，农民的主体开始受到关注。”^⑤如同延安时期左翼文化通过对说书人的改造，让农民自己登上舞台，用说书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通过对娱乐的再政治化。通过对集体世界的想象，对乡村公共生活的关注和为人民主体的塑造^⑥，将个人（农民）召唤为新

^①同上，164 页。

^②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165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③孙立平、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5），1—17 页。

^④光明：《安康汉剧团演出的〈楚宫〉观后》，见《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纪念刊》，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大会编，67 页。

^⑤罗小茗主编：《制造“国民”：1950—1970 年代的日常生活与文艺实践》，82 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⑥同上，102 页。

的历史主体。^①建国之后，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不断强调翻身感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主体性。逐渐，农民的主体意识觉醒，户县农民画便是一个典型代表。通过绘画，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手创造了一个可供自我认同的崭新的农民主体形象。而他所创造的作为历史主体而出现的农民形象也恰好应合了那一时期文化政治的需要。^②

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第二个定义“所有意识形态都具有将各个具体的个体塑造成主体的功能”^③佐证了上述研究，并对文化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诚然，通过对剧目和艺人的改造，再现了主体与现实生存环境之间的假想关系。但本文提出的问题：一个复杂和矛盾丛生的社会，人民的主体性是否可以简单的归结为由上而下的“召唤”或“塑造”？尤其是，见惯了兴亡成败的农民艺人对于新生政权还存在着“改朝换代”的想法^④，而其行为又多少有着投机取巧和反抗的意味。在私营剧团改造和民间职业剧团登记的过程中，艺人纷纷响应，希望成立或加入国营剧团；而后 1960 年代初精简人员，皮影艺人则在借由演戏合法流动的机会^⑤做起了生意，这是国家严令禁止的。如安康县人民委员会（63）会文卫字第 13 号文件《关于皮影组存在问题的通知》中批评皮影艺人李守恩借外出唱戏贩卖茶叶 8 斤多，桐油 30 余斤，芝麻 3 斗多，旱烟 50 多斤，恒口地区缺苔籽，他就从五星桔地区运来 44 斤苔籽，以 1 斤换 1 斤半大米。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人民主体性？这恰恰需要在乡村语境和历史语境中，研究影戏的传播实践和意义。便会发现民间文化的张力，一方面，深受官方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的文化支配，同时也追求一定的行为自主性。^⑥其次，总是能解构、混融和消化吸收外来文化，将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官方与民间糅合，成为村民的日常生活和生存习惯。新生的国家制度进入乡村，与民间文化系统不断碰撞、反抗、交融，进而诞生出了颇具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传播效果景观，主体性便是在这一过程中呈现的。

首先，作为“把关人”和国家代理人的乡村干部，为了融入“熟人社会”成为农民的“自己人”，增加了他们在乡村的威信，因此传达和筛选信息的标准已经部分偏离了国家意志。尤其是生产队与影戏艺人之间的“潜规则”^⑦。但客观上，也因为他们的妥协，调动了民间文化资源，获得更多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时也让农民看到自身的主体性力量，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主流意识形态。

其次，手艺人，尤其是皮影艺人，他们通过地下商贸活动，成为民间传播的主体，以此反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商品和经济信息垄断，住在渭河边的农民都有记忆，60 年代中后期，（渭河周家渡）每天下午两点到夜里十一二点，号子声从来没有断过。^⑧农民也会通过影戏艺人的合法流动，托他们买卖货物。因此，影戏的演出活动客观上巩固了乡村信息传播圈，尤其是经济信息的共享。

再次，影戏艺人用“隐藏的文本”对抗着“公开的文本”，如《白蛇传》、《二巧离婚》、《穆桂英挂帅》等剧目，穿上反封建、爱国主义、人民翻身当家做主的意识形态外衣上演着；

^①同上，90 页。

^②同上，263 页。

^③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杨竹山等译，167 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④张炼红：《从“戏子”到“文艺工作者”——艺人改造的国家体制化》，载《中国学术》，2002（4）。

^⑤皮影艺人不演出时是农民，在生产队劳动；亦可联系外出演戏，文化主管部门会开具演出介绍信，使流动获得合法性，只需向生产队缴纳一定的现金充当“工分”。可参见沙焱：《流动、传播与社会》，载《现代传播》，2012（4）。

^⑥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414 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⑦即按照规定艺人外出演戏需要将所有演出所得上交生产队的，换取工分和粮食，但常常出现手艺人隐瞒不交或者少交，如果完全隐瞒得罪了生产队，以后生产队从中阻挠，艺人出去演戏的机会就少了，挣钱也就少了；作为生产队，当然希望手艺人出去，因为这部分收入是生产队的现金货币重要来源，如果一个生产队全部都是下地干活的劳动力，那么一个生产队的货币能力将会降低。

^⑧参见访谈资料，2008 年 10 月 3 日，华县下庙乡，滨坝村农民李俊旗家中口述。

再如，影戏演出常常以“庆祝丰收”，“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为由延续着解放前“麦后打吊”和“丰收敬神”的传统，完成农民对“热闹”与“红火”的要求。

因此，在这一时期谈论影戏的传播和传承，政治是其主要维度。反问这一时期，影戏的意义是谁的意义？不难发现，意义在于村民的主体性觉醒，主体依然在于从村民。诚然，政治的力量起到关键作用，但仍难以达到“召唤”和塑造，而是与乡村文化碰撞出村民的主体性。正因为影戏的特殊角色，无论是老戏新唱的戏剧挖掘整理工程，还是借由手艺人身份的合法流动，会演被领导人接见等，都使影戏成为新旧制度安排和文化碰撞过程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影戏已经深入到乡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意义世界之中，参与建构了农民的主体性意识。

三、1984 年至今：意义在市场——作为符号的乡村归来

为什么 1966-1984 年，近 20 年的时间被跳过？首先，1966-1976 文革十年，是 1949-1966 政治维度的延续和加强，并无新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这十年，民间文化的张力只是减弱，但一直存在，并没有消失。^①其次，1976-1984，作为购买力的生产队、大队等集体组织依然存在，同时改革开放之后商品经济的潮流已经在乡村悄然兴起，私人的文化购买力也相对增强，公私的合力导致影戏最后的繁荣，并最终于 1984 年关中农村分田到户为标志结束了这种繁荣；这 8 年，因为公社体制的存在，影戏的意义依然主要在于政治维度，但从中也能看出商品经济对乡村文化的影响日益增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影戏没落了。没落的影戏偏偏赶上了诗性年代的尾巴，甚至在 90 年代初，媒体上常常能看到“渐行渐远”、“最后的”、“叹息”等字眼；艺术咖啡馆里、大学讲坛里热泪盈眶、痛心疾首的行者、摄影师或者演讲家，他们感叹于文化的冷漠、社会的浮躁功利、民族血脉之不存。冯骥才曾说：“民间文化是一种母亲文化，它给我们情感，给我们血肉..它在迅速的瓦解、消失，我们必须进行抢救，把它保护起来。”闻者潸然泪下。

这一没落，意味着影戏在政治维度的意义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而结束，在媒体、学者、文人的热情呼唤呐喊之中，现代人很快觉醒，并嗅到了其中“微妙”的经济价值，于是遗产保护的理念也悄悄的从“原真性保护”转移向“生产性保护”、“保护性开发”，“非遗”中的政治资源、历史资源、文化资源蕴藏着亟待开发的市场价值。

终于 21 世纪初，影戏再度繁荣。作为民间文艺形态，其繁荣首先在于乡村的归来。连续十年的国家一号文件强调乡村是国家发展的重点。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其次，影戏的繁荣在于文化保护。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到 2006 年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②2011 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十七届六中全会更是提出了“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推动“文化的新觉醒”和“文化的大繁荣”。

在“乡村归来”的呼声中，无数的都市人陶醉于这样的想象：黄土地上，老槐树下，听上一段皮影戏，在古老的故事，和无边无际的夜色中沉浸。在媒体呼吁、政府鼓励、市场运作、法律保障之后，乡村艺术也响应时代，懂得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道理，摇身一变，成为宠儿。

中央对每个国家级传承人每年补助一万元，陕西省对每个省级传承人每年补助 4000 元。

^①关于“人民公社与民间文化张力”的研究，可参见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②《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6〕18 号文件。

每个非遗项目每年均有从百万到几万元不等的抢救经费。而大大小小的文化产业工程，文化产业园、文化生态园、文化博览会等等投资动辄数千万，几亿甚至数百亿都不在话下。2006 年华县将皮影列入县“四张名片”之一，同年，华县皮影成为国家级的“非遗项目”；2008 年，华县皮影产业群也从“全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到“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在其产业群中，雨田文化产业集团一家独大，着力于打造华县皮影的文化品牌。

曾经，影戏是参与建构乡村社会结构的主体，是碰撞出人民主体性的重要力量，而今，影戏仅仅成了“名片”、“项目”和“品牌”。政府调动三十年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借用这样的符号来完成乡村文化的复兴，换言之，初衷在于借经济的力量发展文化；但事与愿违，结果成了借文化的力量发展产业。于是，文化的归来成了符号的归来。有趣的是，几十年前阿多诺和本杰明就曾讨论过，是生产（初衷）决定了意义（阿多诺），还是消费产生了意义（本杰明）？^①在这里，是消费解构了生产时的意义，并以强大的商业力量缔造了新的意义，却恰恰与代表归来假象的符号相吻合。换言之，实践雄辩的证明，今天影戏（文化）的意义在于市场。

在这样的政策主导和产业带动之下，艺人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主要包括艺人对自己的认知和他人对艺人的认知。几十年来，艺人一直认为自己是农民。有趣的是，这两年艺人看到“传承人”、“国宝”等话语的力量，开始意识到“头衔”是一种资源，他们的话语体系发生了变化，一开口便是“我们老艺人”，“我们民间的艺术”，皮影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要好好保护、传承”等等。这些极为熟悉的词汇从乡村艺人口中说出让人感到陌生。就曾有人来清华大学找过笔者，希望帮助撰写（或录制）人生传记，他说“不能让文化的根断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同时，将看戏作为生活方式的农村看不到戏了，商人为市民义演，告诉他们原生态的艺术要传承，永远是脸谱化的三折戏《刀劈韩天化》、《借水》、《卖货郎》，市民们观赏完毕，称赞其艺术价值，同时做出“要保护民间文化”的道德表态。

在这个逻辑中，国家话语和文化符号日益程式化，成为市场想象和道德面具。那么，症结在于，当下影戏的意义是谁的意义？或者说，保护和传承“非遗”，谁为主体？为谁传承？影戏从村民、村庄到国家的影戏，到市场。在政治强力干涉的集体化时期，影戏服务于政治宣传，但农民依然是其目的和归宿。然而当下，作为主体的人迷失了，只要能赚钱，“非遗”的传承与技艺的持有人、艺术的欣赏者无关；更不用说社会维度的意义，在“一村一品”工程和“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带动下，乡村已经成为作为工艺品的皮影生产基地，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日益公司化。市场成为文化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一切为了市场，一切服务于市场。市场是这个阶段的主导意义。

简而言之，纵观 20 世纪以来，影戏的意义主体转移的过程也正是影戏不断脱离社会结构，抛弃农民，不断符号化的过程。

四、未来：谁的意义？

纵观本文，分三个阶段，从三个维度，探索民间文化的变迁。正如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反对将文化视为简单自动地在其主体内部复制自身的观念，而是强调生产、建构或者再造。^②本文强调意义是怎样产生的，而非意义是什么^③，反对复制的意义，每一个具体时代，影戏的具体意义不可复制，本文将意义放置于复杂综合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延续的坐标轴中，分析意义是谁的意义，如何产生，如何与社会互动，这是影戏繁荣与传承的关键。换言之，具体的

^①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杨竹山等译，156 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②罗布特编：《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麦永雄等译，373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③同上，1 页。

意义必然随着社会变迁而改变，但“非遗”传承在“所指”层面的意义本身不能丢失，即“谁的意义”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而不能仅仅作为符号，停留在“能指”层面。意义，是自内而外生发出来的，不是被赋予、被传承和被施舍的。历史的实践表明，影戏调动了空间的、时间的和社会的各种资源，形成了一种传播方式的综合。最终，与乡民的精神意识深度互动，并参与建构了乡民的意义世界。

那么，为什么当下影戏陷入本文开篇提出的“大繁荣的困境”？

从历史的维度展开，清末以来，“乡村-都市”的空间二元结构与“落后-进步”、“传统-现代”的时间二元结构勾连在一起。掌握了文化领导权的新式知识分子需要通过告别乡土中国的文化传统来推进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①从梁漱溟、李大钊开始，中国乡村的觉醒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到 1980 年代的城市改革，乡村文化一直处于逐渐凋敝甚至崩溃的过程中，在政策上国家缺位，经济上资源向城市转移，文化上是知识分子面向海洋抛弃内陆，“乡村、乡土文化和农民形象又回到了落后和将要被抛弃的地位上。”^②

可是在追求现代化的路上走了接近一百年，现代化的隐忧也逐渐显现，农村土地荒废、人口流动、犯罪、社会不稳定、价值观危机、社会失范到处蔓延。无论是出于一个世纪以来对乡村的愧疚，还是“礼失求诸野”萌生出乡村文化的学习和借鉴，抑或仅仅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一个充满“东方主义”情愫的乡村在这个时候神奇的归来了。但此时乡村的归来仅仅是乡村符号的归来。无论是政府官员、市场精英还是文化学者、媒体都在强调乡村和文化，“我是一个农民”、“原生态的民间艺术”引领时尚潮流。于是，土得掉渣的艺术，在豪华的国际酒店演出，无数的闪光灯对准了他们，乡村艺人变成国宝，人们对着“国宝”垂泪。颇具法兰克福学派所批评的“物化”和“异化”的意味。而其背后“意义在于市场”，意义与老艺人无关，已经是不言自明规则。

王铭铭认为，“高等现代性（high modernity）”横扫全球，似乎要取代所有形式的文化，这时强调“文化遗产”的概念，则是要求我们重新考虑一个与此相反的事实^③，即民间文化不应成为“历史的负担”，而是在现代文化霸权生成过程中的一种文化自主性的救赎。^④当作为都市异文化想象和符号的乡村和文化归来，并不能改变乡村“非遗”的困境。正如“非遗”的概念和实践并没有沿着王铭铭规划的路径发展，反现代性的“非遗”反而成为实践现代性的市场工具。出现以“濒临灭亡”的“遗产”求“大繁荣大发展”产业的事实，这本身就耐人寻味。当非遗项目的价值被开发殆尽，政治和市场也将会对它失去兴趣，这也是这门艺术寿寝正中之时，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戏唱完了，也就该收场了。如同煤矿，煤被挖尽，同时破坏的还有文化生态和土壤。

要而言之，在充斥着文化和乡村符号的当下，影戏“被繁荣”和“被传承”。在此过程中，丢失的不仅仅是一门古老的技艺，更多的是乡村文化内在的生命力和主体性。国家发展文化产业当然有经济上的诉求，但是如此大规模的“非遗”保护举动，绝不仅仅是能够在经济意义上获得充分解释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时作为文化符号的乡村归来了，而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乡村则进一步消失了，这两个“乡村”背道而驰，某种程度上，前者的兴盛是对后者消亡的确证，是后者的墓碑。

因此，本文回到社会结构之中探索影戏未来的意义。当下农村，面对流动人口增多、文化传统破碎等现实，如何基于现状建构新的乡村意义系统是乡村传播学的基本话题。现有的理论要么复制西方现成的乡村文化和符号系统，要么复制城市文化和符号系统。而在实践层

^①王维佳：《现代中国空间政治变迁中的知识分子与文化传播》，载《天涯》，2011（5）。

^②同上。

^③王铭铭：《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179 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④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412~414 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面，依然以市场维度为主导，即采取现代企业的经济模式来进行社会设置，那么，全体中国农村很可能都将变成实体公司，但这依然无法解决价值观和文化重建的问题。

基于此，笔者尝试着从再造土地认同和群体性自我价值的角度探索影戏的意义。

改革开放后，土地经济功能的过度强调使农村生活的稳定感和生活意义的取向发生了变化，土地越来越仅仅成为了一种效率较低的货币获取方式，随之产生了农村社会的生活意义与信仰的缺失，于是农民不得不投向市场和其他领域寻找生活意义，传统价值观因之消解，麻将、迷信和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宗教借助这种意义空虚的机会进入中国农村，造成了一系列家庭问题和社会不安定因素。

事实上，土地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社会功能和文化方式。土地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产出农产品，而且还在于提供了心理安全感和农村地区的社会认同。对关中农民来说，拥有土地就意味着基本生活有了着落，稳定和安全感由此而生；土地还象征个体与农村社会联系的纽带，外出务工的家庭大多仍然不愿放弃耕种土地，如果在农村没有土地，就失去了对农村社会基本的认同；出色地完成农业生产还象征着劳动的技能和道德上的正直，在田地中相遇时，关中农民都会互相称赞对方地里的庄稼长势好，并热情地交流农活的信息。

因此，基于土地认同和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将会逐渐趋近于中老年化的现状，农村人群经过青壮年时期外出务工的经济积累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家庭负担，他们回归农村社区，进行土地种植满足基本生活水平，并且可以借助离土不离乡的第三产业获取额外的经济收入。对于这样一个社会来说，文化建设首要的任务是借助群体性的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满足这样中老年群体的文化和精神需求，同时平衡核心家庭和私人媒介造成的社会松散化。传统的人生仪式、社会仪式和手艺可以通过一定的改造适应这种社区，形成新的文化传统。

在对台湾地区进行对比研究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文化传统重建的成功案例。虽然台湾皮影的演出者与大陆同样大多为 70 岁左右老人，但这些老人都是在退休之后才开始学习影戏演出，他们自创剧本，在岛内各大庙会上演出，仅仅收取很少的报酬。^①这些老人大多是台湾南部（主要是高雄、台南、屏东等地）的农民，由于年轻时在城镇工作的经济积累和较好的社会福利保障，他们进行皮影演出的目的已经脱离了经济需求，皮影演出对于他们不再是传统农村社会中赚钱的工具，而是现代社会生活中自我娱乐、自我组织、自我实现社会价值的方式。

台湾地区的这一案例说明，在经过社会变迁之后的农村社区，传统文化能够适应新的历史条件，通过改变自身功能而融入当代社会。基于传统、符合规律而开展的对乡土文化进行功能上的改造应当成为影戏意义建构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①田野资料，2008 年 7 月，中国台湾。

当代新闻传播与文化变迁研究

后怀旧的资本主义城市： 麦兜系列电影中的时间—空间学^①

Post-nostalgic Capitalist City: Temporal-spatial Structure in the Mcdull Series

谭以诺^②

中文摘要：李佩然从香港后九七电影中点出与九七前电影中怀旧不同的“后怀旧”（post-nostalgic）影像学。这一概念有助于理解后九七电影与九七前电影在处理身份政治和本土上的不同。本文借用李佩然的概念，把概念延伸到时间和空间上，点出九七前电影与后九七电影在时间结构上的不同，并利用这种时间结构讨论麦兜系列电影，同时结合麦兜系列电影中空间的展现，点出麦兜系列电影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不同的时间 - 空间学。本文提出，透过分析三种不同的时间 - 空间学，可以看出麦兜系列电影如何打破怀旧式和资本主义式的时间 - 空间装置，以及麦兜系列电影跳出资本主义的例外时间 - 空间。

关键词：时间-空间学，麦兜系列电影，后怀旧

Abstract: By analyzing post-97 Hong Kong cinema, Vivian Lee points out the different sentiment in post-97 films comparing with the pre-97 ones, that is the post-nostalgic. The notion is helpful to illustrate how is the different of the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notion of the local between per- and post-1997 Hong Kong cinemas. This paper appropriates the Lee's notion and extends it from the temporal dimension to the spatial dimension, aiming at pointing out how the

^①本论文已刊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3 年第 2 期。

^②谭以诺：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temporalities are different in these two cinemas and putting the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films in *McDull Series*. Besides discussing the temporality, the spatiality depicted in the series is also of the concern of the paper. The paper attempts to illustrate the temporal-spatial structures of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portrayed in the films, and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structures, illustrate how the series breaks the nostalgic and capitalistic temporal-spatial device.

Keywords: temporal-spatial Structure, McDull Series, Post-nostalgic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起以至整个九十年代，香港电影多有怀旧情怀，以怀旧的影像回应当下身份和政治困局。那时香港的怀旧，并不像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说的怀旧。詹明信强调后现代的怀旧式拼贴没有历史深度，没有历史感。然而，论者如周蕾和陈少红均指出，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的怀旧，并非没有深度，例如周蕾指出，关锦鹏的《胭脂扣》（1987）中以含有特定记忆的旧有影像来表达自己，由此，怀旧的影像既是极为个人，却又可与群体接合。（Chow, 2001）而陈少红则指出，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中的怀旧，指向对过去的内省，对现代的焦虑和对未来的不确定，表明当时社会中渐渐觉醒的归属和寻找自我身份的意识。（Chan, 2000）若说詹明信的怀旧是纯粹符号的拼贴，那么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中的怀旧则是在香港没有坚实的历史这情况下，借用怀旧的影像来替没有历史感的香港加添历史感，并藉此营造社群意识。

然而，在 1997 年回归后，香港电影对过去影像的运用有了另一番的自觉。由此，李佩然发展出“后怀旧”（post-nostalgic）这个概念，用以理解和分析后九七香港电影中的怀旧。（Lee, 2009）李佩然说明，后怀旧脱离了怀旧电影中的世纪末氛围，所面对的不是“九七”这个将临的界限，因而没有强烈的焦虑感，因为“后九七”已然成为事实。李佩然阐明，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怀旧电影是对已然失去或将临失去的焦虑，并试以电影的影像把那失去的留住，那么，后怀旧的“后”所引伸的，就是把已经失去的转化成对当下和将来的诘问。李佩然的后怀旧着重影像上的互文性，不论是影像上的互文，还是类型的引用和转化间。不过，当李佩然运用后怀旧分析电影文本时，很多时会把后怀旧单纯看成是导演自觉动用的互文性，而忽略了另一个在怀旧影像中很重要的元素：时间。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之所以出现怀旧电影，原因在于那时的香港人对前景感到不安与焦虑，不知道在“时间的终结”（即九七）后命运何去何从，因此，当时怀旧影像的时间性是现在与未来断裂，以致需要动用过去的影像形成过去与现在是连绵的假像，从而透过过去与现在的连绵而想像现在与将来也是延续的，以减轻当时香港人对未来的焦虑。对于时间，李佩然只是点到即指，指出本土是位于“过去与现在的裂缝中”。（2009, 13 页）而这个裂缝之出现，是有其社会和物质基础的。香港在回归后经历九七、九八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经济受挫，后来又有 2003 年的 SARS，香港人长久所倚的经济神话大叙事失去效力，这使香港与其自身的过去割裂开来。在这种割裂下，李佩然才能提出有别于周蕾和陈少红的后怀旧概念：驱动电影导演寻找过去影像的，不再是对将来的焦虑，而是与过去的决裂。所以，李佩然的研究问题是：若然香港独异的神话不再，那香港导演该动用过去甚么形像才能弥补与过去的空隙，从而叙说新的香港故事呢？

“麦兜系列”电影——《麦兜故事》（袁建滔，2001）、《麦兜菠萝油王子》（袁建滔，2004）、《春田花花同学会》（赵良骏，2006）、《麦兜响当当》（谢立文，2009）和《麦兜当当伴我心》（谢立文，2012）——正在这个背景下出产的。麦兜系列电影之所以值得留意，不只是它以后怀旧时间观来重构香港的城市影像，还把时间和空间联结起来，成就其独特的时间—空间学，展现出独特的后怀旧视觉景观。本文藉引用李佩然后怀旧的视角，点出麦兜系列电影如何以各种互文的方法再现城市空间，并在这互文的基础上创造出个中独有的城市想像。本文把麦兜系列电影中的城市空间与其独特的时间观连结起来，以补充李佩然后怀旧的不足，在既有的后怀旧理论中加入时间的维度，说明麦兜系列电影如何以其独特的时间—空间学述说有别于经济神话的香港故事。

一、过去—货柜：麦炳的后怀旧

在麦兜系列电影中，最能表现出怀旧维度的，是系列中的第二部《麦兜菠萝油王子》。这戏承袭了第一部《麦兜故事》的形式，以童话故事为包装，把故事设定在香港这个国际城

市的边缘——大角咀。故事内容是麦太与麦兜的日常生活，其中又插入极多无厘头式的笑话，并在中段后转入抒情叙事。故事主要场境——大角咀和春田花花幼稚园——都是活在濒临结束的边缘，大角咀的旧唐楼为市区重建局所收购和改建而面临拆卸，春田花花幼稚园则是因经营困难而面临关门的边缘。麦兜的故事不只是从一般底层市民的角度出发，而是明显要复写过去香港经济成功的大叙事：在麦兜系列的电影中，香港（或大角咀）的再现并不是甚么国际金融大城市，也是不甚么亚洲的金融奇迹，而是一个不断在重建中的繁杂都市，不断在破旧中建造的城市。这与先前所谈及后怀旧的时间性相仿：与过去的神话断裂；而大角咀的时间性也很有兴趣：一个不断重建的地方，但在整个系列中，并没有看到重建带来的改变，是以其中含着一种不断运动的停滞。所以说，大角咀的边缘加上不断重建的停滞，就是《麦兜菠萝油王子》的时间—空间的展现。

《麦兜菠萝油王子》除了有麦兜系列电影常见的大量片段叙事外，还有故事中的故事。

《麦兜菠萝油王子》中关于“菠萝油王子”的故事，其实是麦太为了安抚麦兜而说的，关于麦兜爸爸麦炳。故事起始如麦兜自身的故事般，充满童话的气色，由王子冒险锻炼开始，最后却变成是王子落难的故事，调子一如麦兜系列电影所有的麦兜般，没有向上爬升的英雄，只有一直在徘徊平民生活的草根阶层。表面上这个王子的故事是童话，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关于“佬”（成年男人）的故事。

菠萝油王子最后流落于香港，这是上一代香港人最为熟悉的故事。上世纪由于中国内部动荡不安，不少人逃难到香港这块殖民地上，较大规模的流徙当然是二次大战中日战争和战后国共内战之时，造就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难民社会和后来南来华人心中的流徙（diaspora）状态。这流徙状态一直留在香港人的心里。直到九七回归前，不少香港人惧怕共产党的统治，及对未来前景不确定的焦虑，流徙心态又再次被调动出来，形成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的怀旧电影。《麦兜菠萝油王子》中“菠萝油王子”的故事则挪用那时怀旧电影的影像来拼合它的世界，所以观众可从中看到不同时代的影像。是以，“菠萝油王子”中的“香港”，虽然看起来像是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但却并不指涉某个特定时段，而是八、九十年代怀旧电影中对香港的想像。麦炳和麦太恋爱故事的形式，原形是从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来的，麦炳写“菠萝油王子”这故事的原稿纸叫人想起《花样年华》中男女主角聚首写稿的情形，而电影用《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六十年代的名曲，同样叫人想像《花样年华》中用《花样的年华》这歌，至于麦炳和麦太在电车路旁并肩走的片段，当然是来自王家卫的《阿飞正传》。然而，若仔细看《阿飞正传》和《花样年华》，就能发现其中对城市空间的再现并不多，镜头多数集中在物件、室内空间和演员的近镜上，这表明王家卫再现五、六十年代香港时的困难：现在香港的地貌和城市景观已与五、六十年代香港大大不同。难怪不少导演要跑到泰国的槟城去找旧香港的味道。相反，由于麦兜系列电影是动画，不受现实地貌和城市景观改变的限制，能随心所欲构作动画师心目中过去的香港，而当中最常见的就是唐楼、戏棚、大排档和天台屋。是以，《麦兜菠萝油王子》与王家卫电影都可说是怀旧，但在影像上处理却很不一样。王家卫以镜头凝视逝去之物，如电风扇、热水壶和旗袍，因此他电影中的怀旧是断裂的，因为过去与现在的物之间看不到有机的连结。但《麦兜菠萝油王子》却相反，当中呈现的空间是唐楼、戏棚、大排档和天台屋，虽不能说它们是遍布香港，但是也不能说这些空间已经完全消逝，它们在现在的香港还是可见的。电影这样处理所强调是过去与现在的连结感，纵然这连结逐渐消逝。电影不只透过再现这类空间而强调连结，还透过把现在的建筑放到麦炳的空间里去，加强两个世界的连结感，其中一例就是麦炳和麦太约会时看见的青马大桥。

后现代主义者或会说电影把现在和过去毫无差异的混合在一起，是后现代社会时空压缩的症状；但若以后怀旧的视角去理解，这里过去的影像并非单纯是对旧世界的复制，动画师是非常自觉地在怀旧电影中取材，透过挪用怀旧影像述说当下的香港本土经验：那些空间，

真正被现代城市发展慢慢吞噬，一如“菠萝油王子”故事外麦太和麦兜的生活空间：不论是春田花花所在的唐楼还是麦太和麦兜的居所，都受着市区重建的威胁。可以说，现在与过去的连结并非因时间而减弱，而是因市区重建局的重建项目而消逝。这就是麦兜系列电影与王家卫电影的不同：一方是凝视逝去，以弥补同时强调现在与过去的断裂；一方是把镜头放在过去与现在都有的日常生活的空间，点明过去与现在的相连性，同时诉说这相连性正由于市区重建渐渐减弱。

而吊诡的是，这种城市变迁感，一方面削弱了过去与现在的连结，但另一方面却又是香港几代城市人的共同感受，缔造出香港人作为共同体的共同感。麦炳流落香港，始于货柜码头。影评人汤祯兆对此有独特的见解：

今次货柜码头的主场景，更开宗明义来作一历史的诡异接轨：麦丙（应为“炳”）之流落香江，也由货柜码头始；而香港的经济起飞，也不谋而合由此启步。透过货柜码头的选址，《麦兜菠萝油王子》锁定了香港作为移民城市的基调，此也是香港本土性及世界性的接合点之一。（2004）

汤祯兆指出，货柜码头所代表的是香港经济起飞，是香港本土性与世界性的接合点。然而，我却想把货柜码头放回电影的脉络去看。就在麦炳于货柜码头流连间，货柜慢慢移动和变形，形成一幢幢的唐楼和香港五十年代的街景出来。在叙事上，这可以说是麦炳从流浪到流落“一旧旧埠”（即香港）的跳接，但在影像上，动画师在处理货柜变动的手法，与处理城市大楼拆建的手法并无二致。在此，我们可以把货柜看作是香港的住楼，而货柜的流动性也可以看作是城市发展中楼房的迁拆兴建。若说香港经济神话给香港命名为国际金融中心，那么《麦兜菠萝油王子》则可以说是把香港命名成“货柜之城”。

因此，菠萝油王子的故事并不是重述五、六十年代南来华人流徙的怀旧故事，而是运用并改写八、九十年代香港怀旧电影影像，来叙述后怀旧时期的本土经验。要了解当中的后怀旧，“月宫宝盒”可说是关键。麦炳是个忘不了过去光辉的角色，他虽然曾努力做个平凡人，但他最终还是忘不了他王子的身份。其中一幕说麦炳因相士之言，进到相士说可以回到过去的“月宫宝盒”中。相士的“月宫宝盒”借用自《西游记第壹佰零壹回之月光宝盒》和《西游记大结局之仙履奇缘》中“月光宝盒”这个意象，表明它有回到过去的功能。然而当麦炳从“月宫宝盒”出来，却发现“月光宝盒”并没有把他带回过去，出来后依然是满有唐楼的“现在”。若说周星驰的《西游记》中的“月光宝盒”是能令人回到过去的法宝，那么《麦兜菠萝油王子》的“月宫宝盒”让人了解到自我与怀旧断绝的厢子，而这厢子本身也是“电影”的隐喻。若说八、九十年代的怀旧电影能把观众带回五、六十年代，甚至更远的五百年前寻找自我的身份认同，那么《麦兜菠萝油王子》所标志着的后怀旧电影则表明，这种把观众带回过去的操作在此时此刻已经没有意义，不停回顾最后只会把我们带到死局中，就如电影中的麦炳，复国之路把他带到瀑布的断涯上，无能前进。

不过，菠萝油王子的结局并不是整部《麦兜菠萝油王子》的结局，也不是整个麦兜系列电影的世界观。当麦太讲述完菠萝油王子的故事后，旁述的少年麦兜说：“我爸爸只想回到以前不晓得哪儿，我妈妈只想着以后不晓得哪儿，就只有我一个，留在现在。”这里并不是单纯三条公式（爸爸=过去；我=现在；妈妈=将来），其中的运作要放回电影去看才能看出其意义。在《麦兜菠萝油王子》中，爸爸所谓的“过去”，其实是指香港怀旧电影中的怀旧，在时间意义上是“后退的”（regressive），永远有一个如乌托邦式的时间原点供麦炳去想像，实质上却永远不能回去。我们可以说，麦炳所代表的是麦兜系列电影时间—空间学中的过去—货柜的面向。至于麦兜的现在和麦太的将来，则要放在香港社会的草根性和资本主义结构之中才能理解。

二、永恒一唐楼：麦太的“香港精神”

香港社会的草根性，正正表现在麦太和麦兜所居住的大角咀，而他们居住的大角咀，可以说是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的“原乡”。说大角咀这个草根地区是原乡，缘于香港经济起飞的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或以前，香港的基层都居住于木屋区、徙置区和公共屋村，与麦兜系列电影中的草根性很像，后来因香港经济起飞，居民的生活改善，慢慢有中产阶级的出现，爬升致脱离草根的一群。香港草根性的影像可以说是始于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的《狮子山下》电视剧集系列，当中最为人所熟悉的当然是 1974-1979 年最初那系列，不少后来香港新浪潮的导演也是由此出身的，例如徐克、许鞍华和方育平等，内容反映当时草根阶层的生活。七十年代的《狮子山下》影响深远，2002 年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宣读财政预算案时，也以《狮子山下》主题曲的歌词作结，所构想出的“香港精神”，就是从草根爬升到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经济神话。所以说，《狮子山下》所叙述的草根性，正是日后国际都会香港的原乡，也是香港神话的起始点。而这「狮子山下」的影像，《麦兜菠萝油王子》中也有引用。这也表明，麦兜系列电影所诉说的香港故事，其起始点也同样是狮子山下的草根性，并以大角咀为这原乡的代表。

以大角咀为香港城市的原乡，当中有其出格之处。一般来说，不论在电影影像中，还是在社会学的论述中，香港城市草根的原乡都在公共屋村（公屋）。在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口不断膨胀，港英政府又没有长远的房屋政策，那时不少市民住在山边木屋或政府临时搭建的徙置区。及至六十年代末暴动过后，港英政府着力改善民生问题，才有后来的十年建屋计划，并把当时居住木屋区和徙置区的居民搬至公屋。因此，公屋成为一代人成长的记忆，那种邻社关系也成为怀旧的对象。在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多有以公屋为场境的，例如“富贵逼人”系列、“古惑仔”系列、三集《记得...香蕉成熟时》，陈果的《香港制造》也是以公屋为背境，这显示出公屋于一代香港人和电影人的重要性。然而以公屋为背境有其局限，主要是因为公屋作为集体的记忆，带有向上爬升的一面，也就是香港经济起飞奇迹的隐喻，“富贵逼人”系列如是，“古惑仔”系列如是，都是低下层慢慢爬升成社会中上层。与此对照，麦兜系列电影却以大角咀的唐楼为香港这国际都市为原乡，复写以公屋为原乡的香港神话，消除当中上升的能量，聚焦在其中的草根性。若说公屋为香港提供社会向上流的论述假象，那么唐楼则表明草根阶层之永恒存在。不是说当中没有个别例子能从草根阶层变成中产或上流，而是在资本主义的格局下，草根阶层之永恒，一如麦兜系列电影中的唐楼，从五十年代到二千年代，依然存在于香港。

在麦兜系列电影中，身在唐楼的麦太心中所向往的，是公屋的意识型态，亦即大众所说的“香港精神”——草根向中产爬升的向上，这精神同时暗合着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麦太外表看来温情，但观众往往看见麦太与资本市场的结连，例如在《麦兜故事》中的创业精神，这在《麦兜响当当》中有北上的延续；又如在《麦兜当当伴我心》中炒股票。但是，最能代表麦太与资本主义逻辑相关的，并不是这些片段，而是《麦兜菠萝油王子》中少年麦兜的说去：“我妈妈只想着以后不晓得哪儿。”麦太的将来是十分资本主义式的，不断向处于现在的麦兜要求向前，向上，在阶层上爬升。是以，麦太所代表的将来其实是指对现在的否定，这正是最为资本主义的，想要复制香港经济奇迹神话。而麦太讲述的童话从开始一下子跳到结局并非纯为搞笑，其实是暗合着资本主义的逻辑，以否定现在（细节）而专注于将来（结局）上。不过，麦太所代表的将来，并不是开创性的，也没有为麦太带来另一种生存的模式（mode of existence），体现在麦兜系列电影的重复式笑话中。例如《麦兜故事》结尾那段笑话，麦太和麦兜在大排档中点菜，伙记不断重复说常餐=特餐=快餐=午餐=晚餐=常餐，而麦太则不断循着这个圆环逻辑来点菜，以致她永远走不出这个圆环。情况

在麦太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明天不过是今天的重复，亦即昨天=今天=明天，走不出资本主义的巨大圆环。就连电影的时空设定也一般，麦太与麦兜永恒地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原乡——草根的大咀角。无论麦太如何挣扎，还是会有另一个麦太进占这个唐楼的空间。在此，我们看到了麦兜系列电影中时间观与空间观作资本主义式的结合：在时间上，所有时间都被商品化，是重复和可互换的；在空间上，唐楼作为原乡并没有公屋的爬升能量，而是永恒存在的草根阶层，以配本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我们可以说，麦太所代表的是麦兜系列电影时间—空间学中的永恒—唐楼的面向。

三、现在—离岛：麦兜作为儿童

然而，电影中的资本主义并不是赤裸裸的、暴力式的资本主义，而是极富温情色彩的，因此更显出其难以抗拒。电影中的怀旧也是如此，蕴含在父亲麦炳身上，因此难以割舍。这也是麦兜系列电影高明之处，它没有把资本主义和怀旧概念化，以另外的概念来把困局化解掉；相反，它是把二者实体化到麦太和麦炳身上，表明这两种情感结构与香港人之亲密，犹如亲人一般，要跳过它（他）们，并不能单纯在概念上割舍。这把我们带到麦兜的现在上去。

麦兜系列电影中，麦炳所代表的是不可得的怀旧乌托邦，而麦太所代表的是温情的资本主义。两者都否定现在的特殊性。麦炳要以过去的符号换置现在的真实生活，而麦太则是以未来不断的对麦兜召唤和要求，要求他成为合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力。这在《春田花花同学会》中表达得最为明显与赤裸。《春田花花同学会》是真人与动画混合的电影，真人部份讲述春田花花幼稚园的同学毕业后在社会的境况，而动画部份则是麦兜的童年故事。这戏最特别的是没有了麦太这角色。因此这在叙事上和空间表达上与系列中其他电影很不一样。由于没有了麦太，资本主义逻辑没有了温情的包装，就以真人部份警匪片的叙事表达出来。春田花花幼稚园毕业生有的当上警察，有的是贼人，有的在摩天大楼办公室内当小职员，而戏的结局就是在办公室内枪战，资本主义最暴力的一面表达出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就是以你死我活的形式彼此争夺。至于在空间设定上，由于没有了麦太，没有了永恒的草根性，所以故事场景不在唐楼和大咀角，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地标：中环的高楼。系列中其他电影向来并没有着墨于中环这个香港经济的中心地带，但《春田花花同学会》则以此地为主要场境，来突显电影想要探讨的自由经济与资本主义。

“向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逻辑（也是麦太不断对麦兜的要求），藉此资本主义把“有用”与“没用”分隔开来，“有用”的技能发展下去就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再创造出价值，而“没用”的就应该被摒弃。个体的社会化就是保留“有用”而摒弃“没用”的过程。这种“有用”与“没用”的分割，也造就儿童和成人分割。柄谷行人在分析日本现代文学时，指出现代性发现了儿童。这不是说在现代以前没有儿童，而是说现代性把儿童和成人分割，同时把游戏和劳动分割，儿童要成为成人，就需要教育和成长，把与劳动有关的保留，把与游戏有关的舍弃。（柄谷行人，2003，131 页）这说法在麦兜系列电影中处处有相应：《春田花花同学会》正是儿童与成人的分割，动画部份是儿童的而真人部份是成人的；麦太的童话故事也是如此，当中渗入童话的教育意义，也是为儿童成长而服务。

麦兜系列电影看似是成长故事，但其核心正是反成长的，反抗资本主义对“有用 / 无用”的分割。麦兜系列电影中明显可以看出以麦兜的故事来反抗现代装置的分割，但并不是说系列中所有电影都成功。麦兜系列电影中以两种元素来反抗这分割，而这两种元素也是与地理空间紧紧扣连的。第一种是《麦兜当当伴我心》的童年残余。所谓残余，是指《麦兜当当伴我心》中角色在童年唱歌的经验，而他们在童年得尝唱歌之悦后，在成长的过程中把唱歌这回事忘记了，或说从劳动中把唱歌分割出去，因而唱歌变成了个体生命中的残余。而

代表这残余的，是座落于大角咀唐楼中的春田花花幼稚园。若说大角咀唐楼是资本主义的永恒原乡，那就明白这种残余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部份，在长大后可能在生命中某一点闪现，或可说是被压抑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提醒主体过去曾有过这样的喜悦，其中的逻辑与怀旧相似，虽不是把主体浸沉在怀旧的符号之海中，但也是恋物化了童年的时光，让主体可以得到暂停资本主义这个现代装置的幻象。虽说残余能暂停装置，但却从来不能打破这装置。因此严格来说，《麦兜当当伴我心》的“残余 / 被压抑”的回归并不能打破“过去=现在=将来”这公式，因为它同样否定现在，恋物化过去的时光。

因此，若要跳出资本主义的公式，那就必须跳出公屋的上升神话和唐楼的永恒存在，而希望则是在《麦兜故事》、《麦兜菠萝油王子》和《麦兜响当当》中的承继，这种承继弥合了成人和儿童的分割，是反成长的，因为承继本身就是延续时间，接合过去与现在。所以说，麦兜系列电影特有的现在是过去的进化与延伸。以《麦兜故事》为例，麦兜从黎根师傅学抢包山，从而承继了粗壮脚腿。这一切都是在香港和资本主义的例外——离岛（南丫岛和长洲）——发生的。电影所展现的离岛，并不是“水清沙幼、椰林树影”的旅游胜地，也不是“山环水抱，五蛇下洋，福荫后人”如楼盘广告般的墓地，而是以供切断资本主义运作逻辑的时间—空间。在《麦兜响当当》也是这样，当一众香港人北上寻找新市场更多的赚钱机会，麦兜所到的地方却是遥不可及的武当山。当然，武当山和武术也是可以被资本主义召唤为市场服务，一如香港的离岛也可以变成是游历胜地和楼盘好选择般。然而《麦兜响当当》却刻意不把武术放到资本主义逻辑中（像荷理活的《功夫熊猫》般），而是突出武术之无用，一如壮脚和《麦兜菠萝油王子》的抖脚般。麦兜这一主体一次又一次承继“无用”，坚持自己立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之外，成就了麦兜自身的现在性，以对抗现代性的成人与儿童的分割。当然，麦兜这样对“无用”的承继，并不能轻易打破资本主义装置，它只能让麦兜开拓一个自我的空间——一如在《麦兜响当当》的结局中，麦兜在大角咀一遍市区重建的环境中，开出如花园般的食店。因而可以说，麦兜的现在虽是突破了麦炳的过去和麦太的将来，但同时亦有可能跌进自恋式的独善其身中。若果说麦炳所代表的是时间—空间学中的过去—货柜的面向，麦太所代表的永恒—唐楼的面向，那么麦兜所代表的就是现在—离岛的面向。

四、结论

香港回归后，原本看来是时间终结的“九七大限”已成为过去；原本是构成香港电影时间性核心的“九七”，已不再占据以往所占的位置，因此香港后九七电影中的时间结构与九七前的电影不再一样，而阿巴斯（Ackbar Abbas）所说的“消失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亦不再适用于香港后九七电影。在这一背景中，李佩然提出“后怀旧”视角，从电影的互文性中把“本土”视为问题来处理，以区别九七前文化身份的讨论。由于李佩然过份强调“后怀旧”中的影像互文性，而忽略了其中关于时间的思考。麦兜系列电影正好提出属于麦兜系列电影的时间观，加上其独特的空间学，构成回归后香港最引人注目的电影创作之一。在这系列中，麦炳的时间观是看似是怀旧式的，其实是后怀旧式的，是对怀旧逻辑的反省，从中表明九七前的怀旧电影身份认同的困局：不停的回溯最后只能到达不能跨越的瀑布悬崖，无能回到想像中的王国（怀旧的乌托邦）。而麦炳的空间也是回顾式的，再现五、六十年代的日常生活与城市空间，但不是强调过去与现在的断裂，反而是强调日常的草根生活空间正是过去与现代隐约而有的结连，而其起始点则是在货柜码头。成为城市变动不居又同时是永远的变动的隐喻所构想的，就是过去—货柜之城。

麦兜系列电影不只停留在过去的时间—空间学中，它还提出新的时间—空间学，以走出怀旧带来的困局。然而，麦兜系列电影中新的时间—空间学是有其运作的社会和物质的

维度。后九七香港经济神话破灭，但作为资本主义城市，它需要继续运转下去。大角咀是城市永恒的背景，麦兜系列电影则把这个背景放到前景来，代表着资本主义城市中的草根性，既是资本主义的背景，又是它的支点。大角咀唐楼去唐楼来，正正把香港这城市再现成永恒—唐楼之城。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麦兜系列电影中现在的时间—空间学。麦兜的现在不断拥抱被资本主义视为无用而排除在外的例外，所以不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现在这部份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例外，例外的时间（承继而来的无用）和例外的空间（不为资本主义服务的空间）。麦兜系列电影中提出，要把例外（承继）并合到主体之中，视为构成主体的重要部份，那才能打破成就资本主义的例外，才能成就麦兜系列电影中的现在—离岛的面向。

参考文献：

Chan, Natalia Sui-hung. 2000. "Rewriting History: Hong Kong Nostalgia Cinema and its Social Practice." In Poshek Fu and David Desser, eds., *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52-288.

Chow, Rey. 2001. "A Souvenir of Love." In Esther Yau, ed., *At Full Speed: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erless World*. Minneapoli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9-230.

Lee, Vivian P. Y. 2009. *Hong Kong Cinema Since 1997: The Post-Nostalgic Imagin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京，三联书店，2003。

汤祯兆：《〈麦兜菠萝油王子〉的本土性问题》，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网页，2004。

全球传媒论坛

财经新闻教育异军突起：永不消逝的潮流 The Rapid Rise of Financial News Education: an Eternal Trend

安德鲁·拉奇^①

廖蝶儿^② 译

几年前，我就意识到财经新闻教育的重要性。在我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第二天，一位同学在课前找到我说他被任命为一家主流日报的学生通讯员。他负责撰写的是一个关于第二天即将要颁布的休利特帕卡德代理声明的报道。他问我是否介意回答几个问题。我说没问题，随便问。

“这太棒了！”他说。随后，他问我：“什么叫做代理声明呢？”

现在的学生与十年前的那些学生差异很大：

第一，他们经历过极端的经济现象，或强劲增长或急速萧条。一些过去需要几年才能形成的经济现象现在瞬间就能发生。

第二，他们已然观察到当今世界各地的经济是多么紧密联系着，牵一发而动全身。当时谁会想到欧洲经济会自身内在爆发？类似于希腊这样看似对世界无足轻重的小国实则在经济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响了许多国家。

第三，他们已经见识了品牌的力量，而品牌的受欢迎程度通常年年不同。举个例子，芬兰的诺基亚一度是手机行业的创新领军者，但是现在已沦为低价手机的制造商。没有谁想永远只生产相关产业的低价产品。对全世界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苹果总裁乔布斯的去世就如同他们家人去世一样令人悲痛惋惜，正因为他们无比仰慕苹果品牌独具匠心的设计制作。

第四，在这些学生眼中，商业与经济是不同于其他主题的，最具价值的新闻领域。过去，经济只是偶尔会成为最有趣的话题。然而现在，经济话题几乎已成为了人们每日关注的焦点。

第五，他们意识到 GDP 是很重要的，但是诸如医疗和教育这样的议题对于每个国家目前和未来的长期发展是同样重要的。不论历史原因或经济系统，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每个国家的重大议题。

第六，随着全球经济成为现代人关注的焦点，他们有极佳的机会通过报纸、网络、广播、期刊和书籍来交流。如果他们选择学习相关技能，这些信息都会浮现他们的指尖。在过去，每个媒介都会认为自己是是最重要的，但是今天的学生们能够熟练运用技能来联系不同的媒介并互相转换。

一些我所教过的最优秀的财经新闻学生已经成为体育记者：

首先，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是在商业还是体育领域，你都必须做到数据准确。你没有任何借口不做到这一点，因为做不到这一点，每位读者都会很快发现。

然而，你不需要所有的数据，而只需要做好那些最重要的事。关注那些无足轻重的数据会耗尽每个人的耐心，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同时失去读者和观众。

^①安德鲁·拉奇（Andrew Lackey）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华特克朗凯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

^②廖蝶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最终，新闻毕竟是关于“人”而不仅是“数”的。只有当报道的角度涵盖人物，才能真正凸显出它的重要性。没有人物语境的纯数字报道乏味而无趣。

今天的事实情况是——在任何一种报道中都会有钱的影子。从电影票房到汽车销量再到贸易数额，各行各业的数据正在被广泛报道。它们影响着市场，决定着公司的命运，为每个人设定着长期或短期的趋势与走向。

所有胸怀大志的记者都必须掌握商业知识。这不是一种奢求，而是一种必须。不仅财经新闻就业前景是最好的，这些信息本身对做出个人决策与评估他们所在的、及影响他们社区的公司也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我父亲曾问我，学识渊博有何益处？显然这是没有弊处的。

在财经新闻培训中，所有胸怀大志的记者们必须搞清楚公司是如何挣钱的。他们必须理解资产负债表、会计、产品、服务及潮流。这种追求需要好奇心、仔细研习、记忆及多次的调查。财经记者不能够停留在数据的表面。

他们必须要理解公司在文件中是如何报告它们的结论及经济情况的。相关文件的失败调查导致了安然公司的破产，伯纳德·麦道夫罪恶的经济计划使无数公司、个人及国家坠入经济绝望的世界债务危机等。在每次金融灾难背后都是公众们委托授权的“监察者”的工作失职。

很多记者由于自己缺乏技能和决心，不断忽略了很多装帧完备、内容详尽的经济文件。通常，他们因为不知道该问些什么，从而问了很多无关紧要的问题。显然，他们没有能够成功服务于读者和观众的利益。

他们不仅需要理解本国的经济，还需要理解其他国家的经济。新兴国家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的面貌，而这一切都才刚刚开始。例如，没人知道还有多少国家会加入“金砖国家”，因为它正在拓展自己的规模和影响力。今天的记者必须能够明智地解析出那些并没有长期相关记录地区的经济趋势。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可以都被称为“新兴国家”，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商品使用者到商品购买者，从商品消费者到商品制造者，情况都大不相同。我们应该充分分析每个国家的公民情况与经济形势，从而获得全面恰当的背景知识。

诚然，数据可以从多种方式来解读。政府间正在进行的会谈非常强调这一点。我认为我在 CCTV-9 出镜时所表达的不同观点正说明了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看待事情。以一国汇率的上升为例，在那些与之有竞争关系的国家眼里，这则是该国没有及时提高对应贸易差额的表现。

我自己的财经新闻课程包括一个股票投资竞赛。在竞赛中，每位同学挑选世界范围内的若干股票作为假设的投资组合，从而互相竞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看到他们所选组合的成败。他们之前显然忽略了这样的经济观察角度。

美国幽默主义作家马克吐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懂得了投资的不确定性。他分享了几个自己对经济的看法。

十月。这是股票市场投机非常危险的月份。其他的月份有七月，一月，九月，四月，十一月，五月，三月，六月，十二月，八月和二月。

银行家总是在阳光普照的时候借给你雨伞，但一下雨就会让你归还。

剥制师和敛税者的区别在哪里？答案是剥制师只会带走你外在的皮囊。

人的一生中有两次不能投机的时刻：一是他输得起的时候，二是他输不起的时候。

我的一堂财经新闻课程是以学生们对经济政策及未来的辩论结束的。我让学生代表美国或中国参与辩论，所以就会有中国学生代表美国或美国学生代表中国的情况。当激烈的辩论结束后，他们总是说：“这比我预想的要更加复杂。”

财经新闻能够，也必须所有学术层次进行教授。因为当今的商业世界和经济是全球性的，所以财经新闻教育也应当走向国际化。一个地区的经济问题预示了其它地区的相似问题。

我很幸运地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以纸媒、网络、电视和书籍报道过财经类新闻。这是因为财经是真正适合多媒体报道的领域。我曾做过辛迪加报业的专栏记者，电视主播，网络写手和丛书作者。但是，把所有的这些媒介整合起来是需要费很大的功夫的。另一方面，这里的学生将带着未来所需要的本领进入职场。

我了解中国的第一扇窗户是年轻人。十多年前，我在开始教学生涯的时候结识了他们。那时跟现在一样，中国的年轻人承受着来自家庭，国家和大学的压力。成为最棒的、让每个人都以自己为傲的使命总是颇具压力，煞费脑筋。然而，他们展示出了学习和面对新挑战的能力。我特别享受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结识来自全世界的学生们。他们来到这里，获得了一个全新而重要的，看待未来的角度。

现在，我们正在展望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接下来的十年。这样全球化的十年将成为一段带有不确定性，惊喜，合作，新兴产业和产品的经济时代。同时，新十年也要求各所大学能够跟上革新的步伐。当我走访了一系列的国家后，我发现普通人都想赡养家庭，希望子女能够比自己强，晚年能够幸福舒适。这些基本的渴望是普遍存在的。

对入职新闻行业的学生来说，准确向读者和观众传递相关信息是很重要的。

这些理念在清华都得以实现。我相信，在我自己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华特克朗凯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这些也同样得以践行。我们的学生通过纸媒、广播、网络的报道实践来学习。

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开设新闻课程，我本人也在积极推进这项工作。但是，处理不确定性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我们正面对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在唐朝，著名诗人杜甫曾经历过一段颠沛流离的时光，并写下一首名叫《成都府》的诗：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

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

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

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

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

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

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

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

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当下，你我都穿行在这个商业、经济和新闻全球化的新时代。新形势对世界人民都很重要，而且给新闻从业人员报道的准确性和深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不仅是下一个十年的挑战，同时也是荣耀。

近期学术活动信息

外国新闻史研究会 2013 年度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一年一度的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年会及学术研讨会今秋在复旦大学举行，主题是：“历史与异乡：外国新闻传播史的维度”。此次研讨会由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 985 基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全国各院校的学者，以及部分海外学者共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985 基地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童兵教授、学院和学会代表孙玮、陈昌凤致辞，郭镇之、黄旦、姜明求（韩国）、张咏华作了主题演讲。马凌副会长主持会议。学者们围绕“借镜”、“比较”、“译介”、“融通”分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常常欲罢不能。会议期间，郭镇之会长还主持召开了理事会议。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新闻系主任韦恩·万塔教授来我院讲座

10 月 8 日下午，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新闻系主任韦恩·万塔教授作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并作题为《新闻媒介与国家形象：媒体报道对民众观念的影响》的学术讲座，和同学们分享议程设置领域的新进展，介绍美国媒体对他国的报道如何影响民众对他国的看法。

万塔教授的演讲主题是探讨媒体议程设置效果的理论解释。他以自 1998 年开始进行的多轮美国民众媒介消费与他国印象调查为基本数据，分析了媒介的国际报道对不同国家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的影响机制，区分了议程设置的一级、二级效应。具体而言，一级效应是媒介议程对公众感知议程的影响；而二级效应则体现在议程和报道对象的属性对公众感知具有的调节作用。万塔教授也专门谈到了社会化媒体时代，媒介的议程设置效应的多种可能机制。

万塔教授曾任新闻传播领域最重要的学会之一“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曾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南伊利诺伊大学、密苏里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以及佛罗里达大学任教，并在 40 多个国家发表演讲或宣读论文，完成的文章和论文超过 150 篇，已出版 5 部专著，现担任 9 家新闻传播领域重要期刊的编委会成员。作为议程设置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的学生，万塔教授多年来持续从事媒介效果方面的前沿研究，是政治传播领域里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学者。

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金兼斌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讲座吸引了校内外师生近 80 人。全球财经新闻硕士项目的教授简·萨辛和瑞克·邓纳姆，《朝日新闻》前高级编辑泽村互先生等也一同出席了此次学术活动，并与万塔教授进行了互动讨论。

史安斌教授出席“金砖五国”媒体发展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10 月 9 日-13 日，我院副院长史安斌教授赴柏林出席由德国博世基金会举办的“金砖五国”媒体发展论坛暨中德媒体对话，做了题为《魅力攻势还是魅力守势：中国传媒“走出去”工程的批判性审视》的主题发言。他结合大量事实、数字和案例说明了中国传媒走出去工程实施的意义和效果，对西方知识界和传媒界对中国对外传播的一些偏见和误解进行了剖析和纠正，并对提升我国对外传播的时新性和针对性提出了建议。来自世界各国的近百名学者和媒体业界人士出席了此次论坛和对话活动。